

平反八九民運！立即釋放蔣彥永醫生！



中港人民大團結！結束一黨專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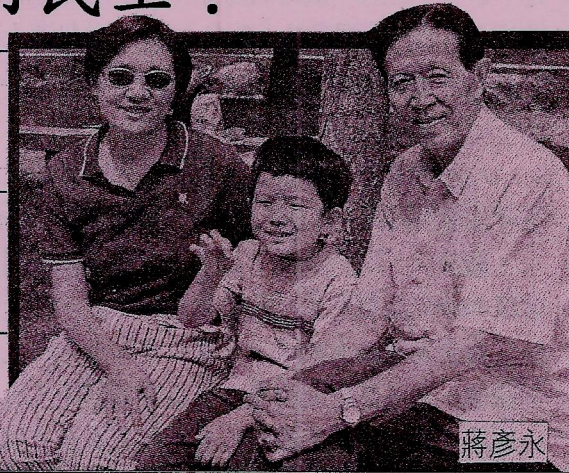
還政於中國人民！

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和黨內民主？

香港言論自由在受侵害

歷史不會停 信念不會改

為同性戀的解放而鬥爭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國際會議聯合公報

歷史的教訓和理論

——蘇聯崩潰後討論有關蘇聯性質的各個理論問題

中港人民大團結！結束一黨專政！ 還政於全中國人民！

十月評論社

去年7·1大遊行，表達出港人對特區施政的極大不滿，展示了港人的偉大力量和政治覺醒；11·23的區議會選舉，港人繼續發揮力量，保皇黨遭到慘敗，港人增加了自信心！

京官驚懼香港人民力量興起，便由人大常委會決議剝奪港人要在07、08年雙普選的民主權利，並作出釋法，企圖迫令港人支持「愛國愛港」的保皇黨人掌政。北京和駐港官員又大施壓力，對港人各項民主訴求亂扣帽子，說港人遊行示威就是搞對抗，即是向中央或人大常委會施壓；要求「還政於民」即是「港獨」；喊「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打倒中國共產黨……。幾把「名嘴」在壓力下被逼「封咪」；陳方安生在外國雜誌發表文章，遭到全面圍攻。《基本法》保證港人享有的各項言論、出版、新聞、遊行、選舉等自由權利，都被京官任意剝奪踐踏，港人大為反感！

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來港，聲稱要與各界溝通、團結，却堅決拒絕與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會面溝通！京官以統戰和威迫利誘等分化手段對付港人，手段越益高壓，高調定性「敵我矛盾」，激起港人的反感和抗拒，更加要用腳（遊行、集會）、手（投票、寫作）、口（發言、批評）來表達不滿！

人大釋法後，事態發展顯然與京官意願相反，特區管治越加困難，中央威望大幅下滑，社會日益分化！

鑑於7·1遊行和9·12立法會選舉即將到來，京官深知硬功必招惡果，民主派反得實利。於是改變手法，由唐家璇故意放風：中央一直有派人與民主派私下溝通。這透露中央的確一直在對個別民主派人士作「統戰」功夫。應當指出，香港民主派在爭取與中央溝通對話時，必須堅持原則立場，否則必遭港人唾棄！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選擇在非洲訪問時發表「軟功」講話，指中央與香港民主派沒有矛盾和衝突，不明白民主派與中央和解的說法；中央與香港各個階層

各種人等（包括與民主派）應該溝通云云；藉此向國際社會擺出「開明」姿態，向港人散播統戰迷霧，為7·1遊行降溫。說中央與民主派之間無矛盾和衝突，並不符合事實，否則也無法解釋駐港中聯辦官員和陳佐洱等對民主派的強烈指責和敵對態度。

曾慶紅雖然表示，香港社會不要分化。但「始作俑者」，不正是京官及人大的高壓言行，大大加劇了香港社會的分化嗎？

去年7·1大遊行，「還政於民」是主題口號，今天仍然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有根有據的。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去年七一提出「以民為本」、「貴民親民」、「新三民主義」等執政理念；中共更喊了幾十年「人民當家作主」，不但是在國號，而且在各級代表大會、政府、軍隊、法院、檢察院、甚至醫院等等的稱號之上，都加上「人民」兩個字，彷彿非常尊重人民擁有全部國家權力似的。

港人要求名符其實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那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而且，不但要在香港，更要在中國大陸爭取還政於民，由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祇有中國大陸有民主，香港的民主前途才有保證。中港同胞利益相通、血肉相連、休戚與共！

我們呼籲全港愛好民主自由的市民，共同努力：

- (1) 爭取兩岸和平統一，中港人民大團結，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由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
- (2) 爭取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2008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反對人大釋法剝奪港人民主權利，爭取落實高度自治的港人民主治港！
- (3) 爭取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由港人普選產生，向香港市民負責！
- (4) 保衛港人享有選舉、言論、出版、新聞、遊行、示威、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反對任何干預施壓！

2004年7月1日 於香港



港人偉大力量的 又一次動員

軍行

今年7·1的大遊行，又一次顯示出港人的力量和政治覺醒。儘管今年沒有去年那樣的異常強烈反23條強迫立法的民憤，但對於人大常委會的專橫釋法，尤其是斷然否決港人07、08年民主雙普選的訴求，卻也是非常不滿的；雖然中央以為在經濟上給予香港一些優惠，便可消解民怨，但大遊行却答覆出港人的「不」字！

回歸以來，香港的民怨民憤越積越深，致使港人不時以遊行、示威、請願，集會等行動來表達其不滿和訴求，因此，近些年來得到「示威之都」的稱號。遠在15年前上百萬人的支援國內民主運動的遊行、集會不說，單是去年與今年的7·1之間，有數以萬計參加者的遊行、集會，便有許多次，包括03年的7·13大遊行、高山大會、04年元旦大遊行，遮打民主大會，4·11的反釋法遊行，紀念八九民運15週年的5·30大遊行和6·4燭光集會等等，其餘較小型的遊行、請願、抗議、集會等更多達數千宗。

今年，在7·1之前，統治層及其支持者曾力圖抹淡、抹黑這次大遊行，說這是向中央挑釁、對抗中央的行動，會破壞香港的穩定、繁榮；加上當日氣溫高近35度，是126年以來最熱的一天，又很少有組織的動員和號召，……可是，這一切都妨礙不了市民自發的踴躍參與，雖然汗流濕衣，有650多人感到不適，甚至暈倒（去年7·1有130人不適，無人暈倒），大多數人都走完4公里的路程。人龍從出發到抵達終點需5小時。這表現出他們上街爭取民主的大決心。

主辦機構民間人權陣線當時依據警方提供的資料而估計有53萬人參加；警方的數字是20萬人（在過

去，警方每次宣佈的數字總是與主辦機構公佈的少很多）；但港大學者白景崇只在金鐘一處統計，即估算全數為10.5至12萬之間；大埔專上學生聯盟只在銅鑼灣一處「抽樣點算」，便宣佈全部人數不到9萬人。後兩者如此明顯不夠全面地估算全部人數，是否要沖淡，矮化這次遊行的重要性，以有利於統治者呢？但即使是警方的20萬人，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至於沿途路旁拍手支持遊行，和各種原因未有上街或改在電視前觀看而「人同此心」的人，更難以勝數。

市民上街是為了爭取其訴求的實現，反對統治層的施政失誤和無能。據中大、港大、城大學者聯手進行的實地調查顯示：今年遊行的15至30歲的年輕人佔約三分之一；上街市民訴求相當清晰，有94%受訪者是為表達對言論自由受威脅的不滿，92%是爭取香港早日實現民主，91%是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同時認為香港的言論自由日漸縮窄的有86%，贊成大會叫「還政於民」口號的有73%；不認為香港民主派愈忍讓，中央對港政策愈是寬鬆的有64%，相反看法的只有18%。（7月7日至9日《明報》載）從這些調查結果可見，被訪者所反映的港人政治認識和覺醒水平是相當高的。

近年來一連串的政治參與，意味香港民主行動的向上發展，也將有利於9·12的立法會選舉，會有多人投票，民主派得票率會推高，所得席位會增加。

往後每年7·1會繼續是群眾大動員的其中一個日子，可使港人不斷得到鼓舞、勝利，贏取更多更大的成果，包括實現雙普選！

2004年7月15日

踴躍投票選出港人的優良代表

振言

回歸後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非常需要選民踴躍投票，選出真正能夠代表絕大多數港人訴求的人士，去努力爭取港人的民生利益和民主權利，改變7年來立法會為保皇黨、保守派所聯合控制的不利局面。

現時組成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由北京中央當日欽點的臨時機構依照中央意旨制定的，目的是要保有其支持者在立法會內的優勢，順利地通過對官方有利的決定。因此，它安排有半數議席由功能界別產生，其中絕大多數是工商界代表（今年由於部份界別無對手參選，有11人自動當選）。也因為如此，特首領導下的施政失誤、執政無能得以持續，立法會不能及時加以監督、建議、阻止及改正其缺點錯誤。這就是港人要求趕快全面普選立法會和直選行政長官的充份理由。但在這一合理訴求仍然橫遭阻撓而不能實現的今天，有資格投票的市民要善於運用自己的選舉權利，選出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打破保皇黨保守派等的控制權，使立法會能發揮其應有的重要作用。這是當前特別緊要的急務。

部份由於年輕人的熱情過問政治，參與活動，今次登記為選民的人數大增，預期投票率也會提高，報名參加分區直選的候選人有90人（包括有幾位不合條件而後來被取消資格的），其中泛民主派有43人參選，親政府陣營則有38人。思匯政策研究所委託浸會大學於7月訪問了1,690名選民的調查發現，58%受訪者支持民主派贏取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席，有半數不擔心這結果會影響特區政府的政策，以及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同時訪問約500名選民，有78%不滿民建聯，其次為港進聯有74%及工聯會有54%；而最多人滿意的是45條關注組（77%），依次為民協（68%）、職工盟（63%）、民主黨（52%）、前綫（51%）。（見8月6日《明報》、《經濟日報》）

民建聯的大失人心，決不是偶然的，這完全是它的「保皇」政策的結果。儘管它有北京的强大靠山支撐，擁有非常優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但它一貫的

「保皇」立場和機會主義的策略變換，又得到了「轉軀黨」的稱號。以07、08年雙普選為例，它曾受社會上强大壓力所逼，一度以之列為其政綱要求之一，但在人大常委會否決後，它又放棄了這個要求。如此反覆的轉軀事例舉不勝舉。

北京中央近年來對香港政治局勢對己不利的發展甚為關注以至憂慮，擔心自己的支持者日益失勢，而泛民主派則日益抬頭。特別是今年9·12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果真的由泛民主派佔半數左右的席位，勢將大大影響董建華的施政，以及中央對港政策的推行。因此，它要採用一切可能辦法企圖阻止泛民主派的得勢，特別是9·12的立法會選舉，它宣稱必須由「愛國愛港者治港」，即是要香港選民投票給「愛國愛港」的民建聯等保皇黨、保守派候選人。許多地方（例如東莞、深圳等地）的幹部也善解中央此意，在多月前已出動「拉票」，通過同鄉關係迫使在港的鄉親必須投民建聯票，甚至要求用可攝影的手提電話拍下選票所投的候選人姓名以作証明。這些「動員」手段給有關聽眾在電台投訴而爆光，以致選委會要加強訂立法例不准在票站內拍攝等等，使得東莞等地方幹部有「令」難行，心有不甘。

在9·12選舉之前一個月，東莞市公安當局宣佈，民主黨立法會候選人何偉途，因在酒店被查獲嫖妓，由公安判處6個月勞教。跟着有一名香港警察在深圳嫖妓，被判罰15天行政拘留。這兩宗差不多同時發生的涉嫌嫖妓案，處罰却大不相同，從而引起社會上的質疑：是否中共要以此事打擊民主黨的9·12選舉得票率？一些外國傳媒在廣泛報道事件時，便認為是政治陰謀。《明報》在幾日內以《未經審訊囚半年不合情理》、《警拘半月 何囚半年 難以服眾》等為題，3度發出社論，批評這兩樣不同判刑的不公。其中更以粗字體着重指出：「這個異乎尋常的嚴懲，難

免令公眾質疑：是否帶有政治打壓的含意？」「公眾心裡不免會想，就算何偉途嫖妓，這樣的處分……是否帶有政治目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何偉途事件，並批評「收容教育」制度違反多項國際人權標準和公約，被告人沒有律師代表和辯護權利，應廢除這種制度。本刊去年第二期（總第213期）曾刊文詳加指責這種制度。但北京的有關最高當局公安部，其新聞發言人郝正勇對此兩案的判刑不同，只說些抽象話，而不能解釋兩案有何不同，以致刑罰大異。他在事發8天之後，仍推說「具體情況他不是很清楚」（8月21日《文匯報》報道），以此推諉作為最高管轄部門的應有責任，反映出東莞市處理不當，理虧難辯。

北京當局為打擊民主黨的威信，影響它在9·12的得票率，手法之一便是搜集民主黨候選人的黑材料，有計劃有組織地公佈，以便抹黑他們。在涂謹申被一靠攏港報揭出買樓漏報公司股份等「醜聞」之後，《明報》於8月24日以「龐大機器蒐集《黑材料》」為題報道：「有民主黨核心人士提到，曾有政界好友奔走相告，指在數個月前，有不少來自內地人士，有傳是內地國安部人員，到中環花旗銀行大廈的立法會圖書館「長駐」了足足一星期，在翻資料、「找東西」，有指他們翻閱的，主要是供公眾查閱的立法會議員利益申報的資料。」

民建聯一區議員已要求廉政公署調查涂謹申此事件，對於「左派」指他以高租金（每月6,800元，連民主黨兩位區議員各3500元，共13,800元，後遷地址為月租8,000元）騙取公帑等問題，將會有調查結果可公於眾。《明報》隨後報道，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忠也以月租一萬元公帑租用民建聯總部兩房為辦事處，比涂報領的更高得多。可見這都是由於立法會有關條例規定過於寬鬆所助長，雖然去年11月選舉前已揭發民建聯蔡素玉曾申領18000元公帑分租其私人公司作為她的議員辦事處，並申領8000元公帑繳交其私人公司的電話等費用。

為配合中方的行動，香港「左報」在此期間天天以大篇幅盡量醜詆民主黨候選人，同時全力吹捧民建處已去函他們需要作出解釋。即使民建聯勉強自圓其說，此事不了了之，但明眼的有頭腦市民，仍可

聯候選人，替後者作免費競選宣傳。

對於民主黨的「黑材料」，可能在9·12之前續有揭出，民主黨的得票率雖將蒙受不利影響，但所失選票大概會流給其他的泛民主派，民建聯難望可從中得利。

這些事件對民主黨等的形象和選情的影響有多大，由於本文執筆時事態仍在發展，暫難以預言，不過，中國官方（尤其是東莞市當局）很可能也是頗大的輸家，威信會受損害。

民主派議員在新一屆立法會中，除了要爭取盡可能多通過改善民生、保障自由權利的立法外，更要致力於促進民主政制的重要改革，以使香港走向民主化，大大推動大陸的民主化進程！

2004年8月25日

後記：

上文寫成交稿後，一些報刊報道，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梁富華和陳國強各以月租7千元合租工聯會物業，作為議員聯合辦事處，4年間共申領了86萬元房津，他們還申領了許多名助理的薪津（此外，陳婉嫻又租有4個辦事處）。

實際上，他們幾乎沒有在該處辦公，陳國強更說從未使用過該處。該聯合辦事處祇有一位助理在接聽電話。由此可見不需要1200呎那麼大。記者們看到聯合辦事處只有一房放一張枱和幾張椅，其餘5間各2、3百呎的房間是課室，應該是供工聯會進修中心的收費課程上課之用的。這顯示三位議員只租300呎地方便夠用了。梁富華在記者會上說，他們承租時，與工聯會有口頭協議，日間由議員使用8小時，其餘時間及星期日則由工聯會的進修中心使用。這就明白地承認租用時間是有限定的，每周5日在5時半及周六在1時以後，都歸進修中心上課之用。但《明報》「發現，4月至6月的周六早上，最少有8個課程在上址上堂。」梁富華又稱，該區租金每呎60元，以17.60元租得，已低於市價，是工聯會津貼給立法會議員工作。但據報道，觀塘地鐵站的寫字樓只租16元一呎。綜合各種疑點，已引起社會上質疑他們有「利益輸送」之嫌，致使立法會秘書處已去函他們需要作出解釋。即使民建聯勉強自圓其說，此事不了了之，但明眼的有頭腦市民，仍可

憑報刊的報道，作出判斷的。

此次選舉之前，許多電視台、電台以至社團，都先後邀請各候選人出席所舉辦的選舉論壇、直選擂台辯論，解說其競選政綱；而許多候選人也利用這些場合，互揭對方的瘡疤，以及過去在立法會辯論民主民生問題時的表態。這使得香港選民可從多個渠道更加了解參選政黨及其候選人等的情况，

從而幫助決定自己投票給誰。儘管在選舉之前仍會有新出現或新揭發的「醜聞」，使許多選民感到困惑、不滿，但大家仍應該踴躍去投票，選出自己所屬意的代表，在下屆立法會發揮民意代表作用，立法改正法例上的漏洞，而不要消極不投票，在客觀上助長歪風胡為！

2004年9月3日

2004年8月10日

香港言論自由在受侵害

微波

香港商業電台最近一連串撤換以至解除多名時事評論員和部份主管的職務，顯示出言論自由在大氣電波中的空間已大大收窄，港人應有的自由權利已受侵害。

商台大清洗的政治因素，應溯源於中央「一報一刊兩支咪」黑名單，京方把去年7·1大遊行等遷怒於這些報刊和電台名嘴的煽動，要除之而後快。早在去年10月，鄭經翰已被一名「有背景人士」多次接觸，「勸喻」他勿在商台節目中攻擊特區政府。黃毓民亦同樣遭到自稱代表國安部人士的威迫利誘，要他停止攻擊政府。跟着李鵬飛也接到國內一位「有地位人物」的電話警告。從而迫使他們要一一封咪走避，香港的法律和警力對他們及其家人的安全難以提供足使他們放心的保障。他們不願自己及家人變成林彬那樣被殺的受害者，因而暫時被迫封咪，這是理應予以同情、聲援的。

商台主管俞琚最初冷漠地責備他們「棄甲曳兵」，向壓力低頭；再而批評他們的評論方向、作風不對，商台要加以改正，今後「不再過份倚仗感性的宣傳，反而加強肯定理性的處理方式」。這透露出她要實行「新人事、新作風」，是全新的轉變；這也意味她要改變兩支咪過去那樣激烈地針砭時弊、敢言直說、批評當權者、同情及支援弱勢社群等言行。

在撤換鄭、黃兩支咪之後，代替主持的原商台顧問梁文道，在短期內也表現出他的博學多才，能言善道，加上學者蔡子強的共同主持，也很受聽眾歡迎；但只因他和原營運總裁蔡東豪，與俞琚有一些不同意見，儘管梁文道已向俞琚表示，倘遇到惡勢力決不退縮，會找警方求助，不會辭職，但很快也遭到解除該

項工作，與蔡子強、蔡東豪、林旭華一起離開商台。在新主持人公開宣佈梁文道「身心疲累，需要休息」之後，梁文道不甘受屈，於是在記者會上聲明他精力充沛，身心健康，以揭破俞琚誇稱商台「聲音擁抱了真理」的謊言。

官方新華社發出評論，批評封咪換人事件只是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並表示對俞琚的支持。

差不多同時，香港電台早晨的「千禧年代」主持人之一的吳志森，則被調到下午負責另一節目，被外間視為有降職的意味。他也是另一位敢言暢論的「名嘴」，深受廣大聽眾歡迎的。

另一方面，廉政公署突然搜查7間報館帶去許多記者手稿等資料，違反了保護消息提供者的原則，將使得市民害怕向記者報料會受到報復，而記者也難得到大量資料向公眾報道，從而收窄了新聞自由的空間。

上述一連串近期發生的事，表明港人一向享有的許多自由權利正遭受逐步侵奪，亟需全港市民起來加以捍衛！



平反89民運！立即釋放蔣彥永醫生！

——紀念89民主運動15週年

十月評論社



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慘遭「人民子弟兵」血腥鎮壓，大批學生、工人、平民死傷及致殘；還被加上製造動亂等莫須有罪名。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血債冤案！

官方為屠城強辯說，動亂幸得及時壓制，才使局勢穩定，經濟得以發展。這是顛倒是非的謊話！北京市民學生的行動和平有序，絲毫沒有造成動亂。如果局勢真的不穩，那恰是一黨專政下官倒猖獗，導致社會不公，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必須對症下藥，正本清源，中國國運才會長治久安！

十五年來，事實證明學生市民當時提出的「爭取民主、反對貪污腐敗官倒」，完全是進步、正確，合乎國情的！

89民主運動被扼殺，中共黨政幹部官僚行徑更肆無忌憚、貪污腐敗更嚴重；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社會貧富不均，工人被迫「下崗」，城鄉差距嚴重，官商錢權相結合，太子黨及各級官僚侵吞大量社會財富，係「穩定」的最大得益者！

中共一黨專政下，由於脫離群眾監管，官僚領導無能，形成黨國、黨政不分、徇情枉法，造成國家的無數損失！

這是六四鎮壓帶來的巨大惡果，中共應該負全責！

慘遭無辜殺害的死難者親屬，十五年來極為悲痛地悼念他們的親人，以丁子霖為代表的親屬，不斷努力奔走，上書中央黨政機關，要求平反六四，為死去的親人洗雪「暴徒」「動亂」的污蔑罪名。但一直得不到答覆！

今年春天，有「中國的良心」稱譽的退休軍醫蔣彥永，不顧個人安危去信人大、政協及中共中央，要求為六四學生運動正名，在國內外產生很大震撼和迴響。信中披露當年中共高層領導人陳雲、楊尚昆等，對出兵鎮壓89學運存有不同意見。甚至連公認為「六四屠夫」的前總理李鵬，也在2003年秋天寫成的「六四」日記書稿〈關鍵時刻〉中，企圖推卸六四屠城罪責，試圖洗脫遺臭萬年的惡名！

這都反映出民間「要求平反六四」的壓力日益高漲，也再一次顯示「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我們深信，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平反六四的日子定會到來！

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

恢復六四事件者名譽，撫恤死難者家屬！

立即釋放蔣彥永醫生及民運人士！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還政於民，由中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2004年6月4日於香港

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和黨內民主？

——兼評黨校部分領導人的改革主張

張開

近年以來，中共黨校等領導人發表幾篇文章，談論政治體制改革、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等問題。它們刊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上，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共部份高層的意見，為今年秋天舉行的中共四中全會製造輿論，鳴鑼開道。

政治體制等的改革

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在今年第11期《求是》上的文章：《關於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思考》，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認為這些改革，是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政治保障。

文章首先指出，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着五方面的「相對失衡」，亦即困難、矛盾和問題：

一是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發展相對失衡。公共教育、衛生、科技創新、文化事業、社會救助、社會保障、社會危機處理等體系沒有相應建立和發展、有的甚至相當滯後。

二是與收入分配的失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農民增收難，收入低；收入差距拉大，這表現在：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不同地區居民、不同職業居民等之間。

三是與擴大就業的失衡。我國勞動力有8.9億，比發達國家總和還要多，勞動力總供給遠遠大於總需求。「十五」期間，每年有1000萬新增勞動力，還有1000多萬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剩餘勞動力近1.5億需要轉移，就業困難人數不斷增加。

四是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失衡，「一些地方」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有些企業，置員工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不到位，甚至違章生產，致使重大生產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嚴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等等。

五是與體制創新的失衡。在政治體制方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亟待加強；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尚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一些基層黨

組織比較渙散，戰鬥力較差；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尚需轉變和改革；人才成長制度、體制和機制尚不健全；政府宏觀調控管理能力特別是處理社會危機能力亟須提高；幹部人事制度尚要加大改革的力度；黨風廉政建設、權力監督機制尚需加強……。

針對以上的缺點和問題，他提出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發揚基層民主，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改革決策機制，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逐步形成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務員制度，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創造一個公開、平等的用人環境和能上能下的幹部管理機制、權力監督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完善各種法律制度，改革執法和司法體制，加強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形成社會全面進步的法治環境。

儘管作者盡量用晦澀、淡化的說法（例如用「相對失衡」代替「矛盾衝突」），但從中仍可看出中國當前確實存在嚴重的難題、社會不公、矛盾尖銳等等，興起着要求各方面改革的巨大壓力，迫使他也要提出改革。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却只是要「深化」、「完善」、「加強」，即堅持這種改革是現時已經存在着的，這亦即只是要對現有體制作改良，而不是對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的徹底民主改革（即革命）。他也没有提到必須廢除各級幹部長期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而只是要他們樹立辯證的思維方式、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本身就不是唯物論的做法，因為存在決定意識，思想教育不能促使幹部們放棄其物質利益特權。

不過，他列舉出當前存在許多方面的困難、矛盾、問題，也反映出中國統治層的不安，企圖設法加以緩解。

事實上，中共中央已經不隱藏、不諱言他們

對當前不穩定情勢的「關注」（實即憂慮）。這可反映在如下的路透社北京電中：

中國領導人經常談及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一名消息人士稱，中國「穩定辦」在四月舉行緊急會議後，向報章、電視網絡和政府機構發出指引，列出需要嚴防九大不穩定因素，包括要求平反六四，法輪功活動，「東突」恐怖勢力，下崗工人對社會帶來的不穩定。由於國企進行改革使大批工人失業，以及政府開墾土地，令到不少城市和鄉間的居民失去居所和土地，加上畢業生難以尋找工作，全國各地經常出現抗議活動，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成功連任，以及香港對民主的訴求。中國政府還關注有人利用互聯網散播謠言、擴大問題或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以及外國勢力利用宗教滲入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蔓延亦被列為不穩定因素。（見2004年6月4日《文匯報》）

上述的9大不穩定因素，還沒有涵蓋全部。中央與不少地方「諸侯」之間政策利益發生矛盾衝突，以及江澤民批評胡溫施政等傳聞近來甚囂塵上。《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中央的宏觀調控損害了沿海地方經濟發展，便是統治不穩定的另一例。

要「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

在各種矛盾衝突日見尖銳化的時候，人民要求民主的聲音和壓力便日見強大。這種壓力，又可從《求是》雜誌去年第12期發表的《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一文中反映出來。

該文作者是中央社會主義科學院副院長甄小英和中央黨校博士生李清華。該科學院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黨校和最高進修學府。文章指出，「當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各種價值觀念、政治文化和政治模式的衝突、比較、競爭和借鑒愈益深刻，這對我們黨……提出了挑戰。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和一些大黨、老黨相繼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看，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條；不改革政治體制、不實行人民民主同樣是死路一條。因此，大力推進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黨……的迫切需要」。

「沒有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就不會有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他們提出「進一步建立健全黨內民主制度，當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健全切實保障黨員和各級黨組織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進一步拓寬黨內民主渠道，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參與；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

同時，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必然導致對民主的踐踏。」當前，要進一步疏通民主監督的渠道，從黨內、群眾、法律、民主黨派、輿論這五方面進行監督。並且要「實現依法執政，……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化、規範化、法律化。」

可是，幹部們仍可以利用「依法」的藉口去謀取私利，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並未得到切實的和制度的保證。甄小英跟着接受《財經》雜誌的專訪，在談到體制、機制的改革時就承認：「當然這些制度也有不完善的方面。比如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買官賣官的現象還時有發生。東北有一個賣官的縣委書記就曾明確說過：『我所做的這些事情是按照程序走的，但是還能夠實現我想讓誰當官就讓誰當官。』這就說明有些單位選拔幹部時，在公開的程序後面往往伴隨着幕後的操作。」

對於黨內民主，目前黨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是幹部委任制，雖然名義上是選舉（甚至是差額選舉），「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委任制。比如說，如果這個地方的黨組織要把候選人中的這位幹部『差』下去，領導就會找他談話，要他當好『差額』。或者提前向他許諾，如果在黨委選舉中當好『差額』，將來會給他安排到政府部門工作。這位候選人本人也會向其他選舉人做工作，要大家千萬別選他。現在民主化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有的單位還搞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黨員幹部都很反感。應該適當擴大選舉的差額比例，讓黨員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這就表現出黨員幹部對官僚黨制「很反感」的一面。

把普遍存在的事說成是「有些單位」甚至「有的單位」的，這是中共公式化地沖淡嚴重性的慣常說法。

對於黨內民主，不但表現在黨員有無權自由選舉領導人上面，也顯示在參與制定黨的政治路

線、政策、批評領導人的錯誤等權利上面。但中共長期來實行的，並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黨內民主並不存在。

既然連黨內民主都沒有，則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中國人民被剝奪去一切民主權利，就更無可置疑了。

對於這些事實，甄小英在上述專訪中並沒加以否認。她而且說：「如鄧小平1980年所指出的，各種權力集中於黨。在黨的『一元化領導』口號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包攬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務，影響了黨的自身建設，也影響了政府效能的發揮和民主的發展。我們沒有經驗，學習了蘇聯的模式，在組織上搞單一的廣泛的幹部任命制，一些本應由選舉產生的幹部，在有些地方也搞成了變相的任命制。」

關於如何才能建立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有效制度問題，甄小英表示很贊同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把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作為重點。前者是把黨代表大會從五年開一次改為每年開一次，後者主要是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但即使加密開代大，仍不能保證黨員能享有真正的各種黨內民主。至於說，「黨員要監督黨代表，黨代表要徵求和反映黨員的意見」，那只是應該做的事，却非保證一定能夠做到的。

當被問及在目前狀況下，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最需要突破和最有可能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是什麼時，甄小英答稱，從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切入可能比較有效。

但是，如何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呢？

甄小英說，「總的方向是解決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現在的突出矛盾是黨政權力雙軌運行，黨與政的很多機構是重疊的。黨和政都去管一個事情，黨政一把手容易鬧矛盾。……而且黨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情，人大、政府的威信就會下降，就會變成『橡皮圖章』。…到頭來，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執政黨上，這種做法很不妥。」

而事實上，「黨政分開」在1980年鄧小平就提出來了，但這仍然成為「現在的突出矛盾」。甄小英說，「這個過程我們也走了一些彎路。現在思路逐漸清晰，就是黨委在同級各類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

則，規範黨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係。」

她所指出的「突出矛盾」，正是中共一黨獨裁所造成的各種矛盾之一。實際上，政府官員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幹部以至領導人，只有極少數是其他黨派或非黨派份子；所有黨政領導幹部都同屬於統治層，不同的只在於黨權更凌駕一切，這正是一黨獨裁的特點。但黨與政兩種權力之間也成了今日的突出矛盾，則這兩者與被統治的人民之間的矛盾已更為尖銳，便可想而知了。鄧小平雖然提出過「黨政分開」，這在黨權大於一切的中國，即等於要黨官僚放棄他們的很大部份手中權力，這是他們所極不願意，而要加以抵制的，因為「有權就有一切」，這也是鄧小平提出了20多年，至今仍無法落實的原因之一。

由此又一次證明：祇有廢除中共的一黨專政，才能實現民主化，使中國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中共的黨員也才能享有黨內民主。

正如前面引文所指出的，「當前，政治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中國也不會例外。除了上引的王偉光、甄小英之外，中央黨校教授梁妍慧6月初也在《半月談》雜誌，呼籲改革黨政主要負責人的選舉制度，由「少數人選」變為「多數人選」，將重要幹部的決定權由常委會轉交予人數較多的全委會。儘管這個呼籲的主張十分溫和，局限於上層選舉上，但仍反映出中共黨內外要求民主的強大聲音和壓力。這些在黨政重要刊物上相繼發表的言論，其可能作用之一是幫助胡溫新領導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他們的相類似主張。

2004年7月20日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在印度孟買市開會

盧塞特著 兆立譯

【來自不同思想起源的各國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第一次舉行了一次廣大的、多元化的會議。

利用世界社會論壇集會的機會，來自五大洲25個不同國家的組織參加了上述會議。

他們首先採納了一個聯合公報（見另一文），然後同意在明年第五次世界社會論壇集會時再度舉行會議。】

由各個激進的反資本主義左派政黨所參加的一次國際會議，於2004年1月20日在孟買市的安迪希里區——因此在世界社會論壇的範圍之內——舉行。從會議的氣氛、熱情團結精神和所參加的組織的政治廣度和數目（48個來自25個國家的組織，另有5個參加過原先計劃的組織在最後時刻未能來到孟買）看來，這個會議真正是成功的。

世界社會論壇的會議永遠是許多組織相聚的罕見時機。這對於籌備論壇的組織而言，顯然是如此的。這對那些支持它們、參加它們的活動的人們而言，也是如此的。這次的世界社會論壇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它第一次在亞洲舉行。參加這一次論壇的，有許多協會、運動和工會，亞洲大陸的兩個極端之間的關係，要比諸例如歐洲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微妙得多。

由世界社會論壇之遷移到印度所提供的機會，因此是特別可貴的。在這方面，15個從歐洲和亞洲來的反資本主義的激進政黨於2003年12月5日發出了一份到孟買開會的邀請信。對於亞洲——太平洋區域，接受邀請前來參加的就有：印度的3個馬列主義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印共——馬列主義解放派，印共——馬列主義紅旗派），巴基斯坦的2個組織（巴基斯坦工黨和PKMP），斯里蘭卡的新左派陣線，澳大利亞的民主社會主義前景，南韓的2個運動（權力歸工人階級和團結一致），以及菲律賓的幾個政黨：菲律賓馬克思列寧主義黨，菲律賓工人黨和在棉蘭佬島的革命工人黨。在邀請信上簽名的，有歐洲的左派集團（葡萄牙），聯合另類左派（西班牙卡塔盧尼亞），革命共產主義同盟（法國），蘇

格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工人黨（英國），和團結（瑞士）。

雖然邀請信較遲發出，反應還是很好的。來自拉丁美洲的有巴西的三個派系（包括巴西工人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派）；來自美國的有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和團結；也有代表來自加拿大和魁北克（包括魁北克進步力量聯盟）；來自非洲的有南非的組織和尼日爾的革命新民主組織。我們應該再提一提：來自歐洲和亞洲的，計有（意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法國的另類出路（Alternatifs）、菲律賓的「携手互助」（Akbayan），和其他的運動組織，以及從西班牙、日本、埃及等國家來的組織。

出席會議的組織各有非常不同的社會植根和規模。重要的運動組織和派系仍然沒有參加。但是會議卻表現了什麼是革命反資本主義的左派、什麼是激進的政黨。它們有不同的思想根源：不同派系的毛澤東主義者、不同派系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許多不能被分類到那一個“主義”的組織成員。

這一次會議之所以成功，是它回應了一個需要、一個欲望。在今天，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是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時代，特別強烈地感到缺乏的是，一個可在各個反資本主義的政黨之間進行國際性合作的骨架。對這件事情的急迫感現在已越來越大了。大多數出席會議的組織都是在許多年前因為抱有最壞的宗派主義而分裂的。這些宗派主義的傳統在1970年代趨於佔據首要地位。從那時以後，互相合作、團結的關係才逐漸被建立起來，超越歷史的和綱領引言方面的分歧。區域性網絡，例如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聯盟和（由澳洲反資本主義左派發起的）亞洲——太平洋國際團結會議，已經形成。反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已經為政治行動創立了新空間，這個新空間不但廣闊，而且從開始就是國際性的。就是由於這一點——這是非常緊要的一點——我們才能夠一起行動，幫助動員能夠成功，而且不只是交換經驗和組織聯盟。考慮到正在進行中的重大發展，各

激進政黨不得不要在政治和實踐上負起責任。

新可能性和新責任這雙重思想感情成為孟買會議的主要心境。第一個行動就是為各激進政黨之間的合作組成一個國際網絡。這不過是最初的一步，沒有任何正式的聯絡。出席的各個組織都非常了解，鞏固這樣一個主動的行動是需要時間的。它們之中的許多組織之間在孟買會議之前互相都不（或不太）認識的！每個人都在思考這個國際聯絡能夠變成什麼樣子：它與以往幾個國際

的經驗應該如何不同？

對於這個題目，明顯的是問題比答案更多。不過已經有了一個開始。進程能夠陸續發展。

【註：本文作者皮埃爾·盧塞特（Pierre Rousset）是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黨員。】

（譯自《國際觀點》第358期2004年4月號）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國際會議聯合公報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政黨，在亞洲——太平洋和歐洲的18個政黨的邀請下，於2004年1月20日在印度孟買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這一次會議的第一個目的是幫助各個從不同大洲來的組織彼此取得聯絡，初步交換關於進行國際合作的觀點，擴大、加強現有的聯繫，但是不試圖將它們正式化，並且開始討論共同的行動。

48個組織出席了這一次會議，5個其他願意來參加的政黨到最後卻不能到達孟買，因此，總共算來，53個分屬於大約25個國家的組織對這個倡議作出正面的回應。大多數參與者來自亞洲——太平洋和歐洲，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也有代表參加。參加會議的政黨有不同的起源、歷史和實力；他們之中的許多組織甚至在孟買會議之前互相不認識。這個會議證明是在一個獨特的時機，使各個從不同大洲來的、具有各種各樣思想傾向的組織締結起新的聯繫。

參加會議的政黨共同具有一個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前景，而且不斷地進行群眾動員，反對軍事的和公司的全球化。他們願意參加會談，願意維護相互間的團結，願意一起進行國際性行動，而因此願意提供建議，使國際主義有新的具體內容，加強全世界人民的鬥爭，精心設計真正代替現有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方案。

這一次會議讓大家在非常溫暖的氣氛中，對有關今日的以下鬥爭交換意見：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支持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的權利，支持民族解放，更大的平等和公共醫療制度，環保問題等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帝國主義，不管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麼，不管在那一個水平上，都要加

以抗爭、加以挑戰和將之推翻。

激進政黨的孟買會議充分支持由美國反戰運動和第四次世界社會論壇的反戰協調所發起的呼籲，將2004年3月20日定為世界反戰動員日。所有的組織都要竭盡全力去幫助這個主張和平、反對佔領伊拉克，及與面對佔領、面對軍事干涉的巴勒斯坦和其他國家人民進行團結的倡議得到成功。

這一次會議選出了一個促進委員會來協調和繼續由這個會議所啟動的過程。現任委員由澳大利亞、巴西、法國、英國、印度、意大利和美國等國的首席代表所担任。

第二次激進政黨會議將於一年以後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為了對下一次會議作出準備，參加這一次會議的各個組織將要在今後幾個月通過e-mail名冊和大家將會參與的國際性會議來交換政治意見。準備性的討論，除了討論其他題目外，將會集中在兩個主要問題上：怎樣促進全世界反對軍事的和公司的全球化運動的增長【原文的直譯是：在反軍事反公司全球化運動的增長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分担的責任是什麼！】和怎樣以與過去不同的方法去形成各激進政黨間的國際合作。

激進政黨的國際會議是向在孟買會議之前不能夠被融合在這個過程中的新組織開放的。

2004年1月20日於印度孟買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第358期2004年4月號〕

為同性戀的解放而鬥爭

德魯克、維托里努

第四國際第15次世界大會一致通過關於同性戀的決議。這幾乎花了五年的努力才取得這樣的結果，並為國際的同性戀工作邁出了一大步。世界大會兩小時的辯論本身表明了為此花了許多時間，也表明了在今後的幾年內會有許多機會取得長足的進步。

由於90年代末以來，同性戀運動在好些國家裡迅速躍起，一年一度舉行的同性戀者自豪的行軍這種形式，使運動迅速擴展起來。現在，在首都巴黎、柏林、羅馬、里約熱內盧，組織成千上萬人的行軍已成為常事。而幾年前那里只有幾千人參加這樣的活動。

在世界大會的討論中，發言人都提到組織同性戀運動的各方面情況，運動從一國到另一國迅速組織起來了。葡萄牙革命社會主義黨的聯合報記者塞奇奧·維托里努強調：第四國際的同志介入同性戀運動，使其成為另類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方面的重要性。經歷了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千萬人就是通過同性戀運動這個平台而來的；去年11月佛羅倫薩第一次歐洲社會論壇也是如此。這些情況，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的發言人都提到同性戀者組織反對進攻伊拉克。維托里努說，整個葡萄牙的同性戀運動都反對戰爭。

維托里努說，好多年以來，人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談論法律改革上。而今，至少在一些國家里，社會輿論開始重視同性戀運動了。維托里努列舉好幾個例子說明同性戀問題與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之間的關係，例如：“反對「煽動仇恨」的原教旨主義者和極右勢力以「禁止同性

戀」來恐嚇反對者；反對以同性戀為由裁減員工；反對限制移民法律（這種法律使同性戀移民面對雙重困難）；反對跨國醫藥公司為了自身的超額利潤不給貧窮國家免費用藥的待遇”。

在大會的討論中還提到了在納粹集中營同性戀者的命運，早先溶合在反對南非種族歧視的同性戀運動，現在又出現在以色列的和平運動，和反對克羅地亞、塞爾維亞等國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鬥爭中。荷蘭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彼得·德魯克就決議問題談到在同性戀移民，特別是在歐洲的穆斯林移民中開展的組織工作，得到發言者（如來自英國的發言者）的贊同。德魯克說：“我們反對穆斯林的魔鬼說教，但伊斯蘭教徒有時拒絕接受西方國家關於婦女和同性戀的觀點是正當的。事實上，伊斯蘭世界有着豐富的歌頌同性戀的歷史，而西方國家的文明對此祇是空有願望。但同時，我們絕不同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反對同性戀偏見作任何形式的調和”。一位美國的觀察員着重指出反對原教旨主義的重要性。

理論和策略

關於同性戀決議的報告包括有：對壓迫同性戀者的根源作出扼要的重點分析；和對1979年國際關於婦女壓迫和解放決議的解釋。在預備會議的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在決議的一些章節的分析中，或者太過着重於資產階級家庭，或者視家庭在近幾十年來變化達到了最大的限度。但在世界大會的討論中，這些問題並不佔到顯著的地位。一位烏拉圭代表爭辯說，決議對家長制度和家庭的研究應該加深。

正如一位法國代表指出的，這次同性戀問題的討論是社會轉變過程中國際上廣泛反映的社會

問題的一部份。對社會轉變過程中的社會問題，我們曾經有過工人階級關於社會主義的狹隘觀點。我們現在愈來愈認識到社會轉變過程中的社會問題是多樣的複雜的。

我們在同性戀運動中的工作不僅反映了第四國際對家長制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也反映了我們對同性戀所採取的戰略和策略。我們認識到性慾的壓抑是社會的和全世界的重要問題，猶如一個人在學徒期間必需服從和循規蹈矩一樣，性慾的壓抑在人的一生中是生理上重要的改變，甚至一個革命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被迫面對這個問題時也會受到傷害。我們也認識到，沒有那一種社會結構的改變會不同性慾壓抑的基礎有關。

依照維托里努的說法，這表明同性戀的鬥爭具有破壞性的潛能，也表明了我們參加這一鬥爭的合理性。他說：革命者在同性戀運動中的工作必需建立在“尊重自主，自我組織，和群眾運動優先的基礎之上，但要干預運動的過激化，要推動同性戀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系，對運動的研究要開誠佈公，支持運動的改革，但反對強制把性慾的壓抑規範化和一體化；這些做法是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改變的。”也不能認為這樣做就是害怕同性戀的重要根源。

配對

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也包括其他地區的運動）要求為同性戀立法，承認同性戀的親屬關係，包括直至同性配對結成的親屬關係。國際大會的討論反映了社會主義男女平權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何等混亂，他們把婚姻看成是暴虐的家長統治的制度。澳大利亞和德國有些過激的同性戀者，我們的支部曾同他們一起工作過，他們簡單地反對同性戀立法的要求，和拒絕參加為此而進行的組織工作。德魯克為決議進行辯護，認為決議是站在「辯証的和變化的」立場上看問題

的。決議從同性戀者眼前的需要和要求出發，探究了為同性戀婚姻進行鬥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和列舉了過激份子必定會加深這些矛盾的幾種手段，例如：要求同性配對婚姻在各方面都得到完全的平等；反對法律上以父母血統出身的中心地位；要求每個人的婚姻狀況自主，不同全體的或個人的社會權利掛鉤。這些就是我們用以爭取同性婚姻完全平等的手段，目的在於打擊和摧毀現行的婚姻制度。

大會的討論一再肯定，在性與家庭問題的討論中，兒童問題是個特別敏感點。有一位代表，是個父親，他對媒體針對追求同性戀自由的人們，把兒童的性惡習視為犯罪，表示了自己的氣憤。他指出大多數兒童的性惡習，大都是異性相戀的，而且是發生在家庭之內。一位來自卡塔隆尼亞的青年代表說，對青少年同性戀者的壓迫必須從全局來考察，這就是普遍存在的對青少年性權利的剝奪。這是當今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的一個特征。

維托里努談到在同性戀青少年進行組織工作的具體問題說：“強硬約束性行為，違反道德的性偏見，性羞辱和性恐嚇的說教就是性壓迫的各個方面，都是針對青年人的。”再者，大多數青年人缺乏性解放的手段，在許多國家裡，由於削減社會福利、加強了青年人對家庭的依賴性，毀壞了他們除了依靠異性婚姻的家庭之外，就不能活下去的基本的先決條件。青年同性戀者特別容易受到歪曲的同性戀情慾的幻想所影響，因為他們沒有經驗，在他們陷於同性戀情慾的痛苦過程中，也沒有人可以諮詢和幫助他們。

有好幾位發言人就個人的性問題發言感到很困難。有一位發言人認為決議談個人或私人問題比談政治問題太多。其他人不同意這種說法。丹麥的一位婦女代表說，談論個人的性問題是困難的，但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過去和未來

第四國際關於性壓迫和性解放的問題的討論並非今日才開始。早在1934年，左派反對派就反對斯大林譴責當年蘇聯的同性戀者。皮涅洛普·杜岡是1979年國際關注婦女解放決議案的作者之一。他隨時提醒這次會議，1979年的文件保衛了同性戀者的權利，特別討論了女同性戀的鬥爭。第四國際1995年世界大會還通過了關於同性戀的16條，這些都是我們今天要遵循的和建立未來廣泛的群眾性國際的根據。

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召開的關於同性戀運動的三次世界討論會，有助於加深理解和增進國際合作。這次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採納了1998年討論會草擬的關於同性戀運動進程的決議；並通過電子郵件繼續在第四國際領導成員中交流，如同在討論會的領導者中進行交流一樣。從開始直到幾天前召開的世界大會都是為了在第四國際同性戀的活動份子中盡可能達到有關同性戀問題的意見一致。由於在決議提交世界大會之前，起草委員會在既有爭議的問題上已經取得協調，所以這個目的是達到了。

一直有人說國際着手解決同性戀問題是太遲了。沒有人懷疑這種說法。一位ACTUP的活動份子說，與愛滋病作鬥爭這個生與死的問題，早在80年代便提出來了，僅僅是最近這幾年我們才重視這個問題。其他發言人認為在第四國際組織中，異性相戀是正常現象。維托里努說：“我們在尋求性問題上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社會裡，異性婚姻關係的特權，性關係的改變和各種同性戀的問題都不會成為社會組織的中心問題。”

維托里奧認為在我們組織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所要求的變化已經開始。“這就是說，把戰鬥員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說成是私人的事情，這

是很成問題的。恰恰相反，正是這一場合，存在着同性恐懼和性歧視的複合症呢。”在維托里努看來，這不僅暗示在我們組織內部反對性問題的偏見，而且是要理解關於性問題的重要性，藉以作為行動的依據。

我們反對有些人以為性的問題並不重要。要知道，在我們組織中有某些人在異性戀愛，或同性戀愛時，我們對此是支持呢，還是讓他們在自我反省中受到傷害。維托里努說：“承認同性戀者有自我組織的權利並非要把有同性戀的同志排除在外”，包括從組織的基層到領導層的同志在內，而這是很少發生的。他還注意到不管有多困難，第四國際組織在建立和促使同性戀運動政治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許多國家裡，國際的支部同現有的同性戀運動都有聯系。維托里努說：“我們一定要把我們每一個戰士為爭取同性戀權利的鬥爭歸納到總的議事日程去。”

法國和葡萄牙的組織是第四國際在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中，工作最得力 and 組織最好的支部。而在他們國家的預備會議上卻沒有提出國際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決議來討論。德魯克在他的總結中提到這次世界大會代表的選舉過程表明了國際遠沒有做好，雖然擔當起草同性戀問題決議的七、八個人中有一半是婦女，有幾個是來自被統治的國家；而在大會上作報告的，却由歐洲支部的兩位男同志來分擔。

從70年代以來，墨西哥革命工人黨便是第四國際支部中第一個注意把同性戀工作作為中心工作的支部，並擔當起該國同性戀運動的重要角色。自那時以來，第四國際更偏重於歐洲的同性戀和性解放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一位烏拉圭的代表要求國際在這個問題上要做到均衡。

（蔚然節譯自《國際觀點》第349期）

歷史不會停 信念不會改

—考約奧崗巡禮

浪果

【編者按：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派遣的兇手暗殺了托洛茨基。在這遇難64週年的日子，本刊特發表如下的托洛茨基紀念館巡禮文章，以紀念這位革命偉人。】

清晨，一輛嶄新的旅遊汽車載著我們十多個中國朋友，離開首都——Mexico City，向著南方出發。這裡氣溫四季如春。正月裡，北來的寒流在墨西哥灣上空凝聚了厚厚的霧，可一待太陽出來，濃霧便很快消散，又復是個美麗晴朗的天氣了。

出了鬧市不到一個鐘點光景，車子忽然停下，我們不覺已來到目的地——考約奧崗。連日來參觀過墨西哥許多名勝古跡，和大大小小的金字塔，今天來看看這個小鎮。這個小鎮的名字我是在1937年的冬天才第一次聽聞的。真沒想到，三年後——1940年她竟一度震動過全世界。

大夥兒下了車，一位穿著整齊西服的斯文長者，趨前用英語介紹自己。原來他就是我們今天“一日遊”的嚮導，名叫荷西(Jose——往後人們都呼他作荷西教授)。他告訴我們：“第一站先去參觀第迪•卡羅(Flida Kahlo)的博物館。理由不單因為她是位墨西哥的名畫家，更重要的是，你們跟著去參觀的托洛茨基紀念館，而她便是為托氏申請來墨西哥的，那位世界知名大畫家——迪果•里維拉的夫人”。

博物館座落在卡文路(Carmen St.)247號，我們購了門券後轉入畫廊。那裡密密掛滿的都是Kahlo各個時期的作品。每個畫室的展品不同，其中以人像居多；也有不少靜物素描和小品，尺寸大小不一。筆觸和用色都表現出其個人的風格。當然，到了現在，這些都早成為墨西哥的國寶了。所有展品前面都用白繩欄著，而且全館裝有防盜設備，參觀者有誰身體稍一越界，警鐘便即大鳴，好幾次我們都給嚇了一跳。每個畫室都有專

責的女接待員，可惜大家言語不通，也祇好光靠荷西教授一人講解了。

我們一眾沿梯轉到樓上，發覺在其中一間裡面，居然有史大林和毛澤東的照片，掛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起，看來很不自然，令人覺得模糊。猜想這很可能是負責管理的人員不明底細，更不理解夫人晚年的心理意向，祇要把屬於她生前收藏的東西都全部陳列了出來；或像許多人一樣，Kahlo當初也相信毛澤東是不錯的吧！

荷西教授告訴我們：這裡本來就是里維拉夫婦的故居，也是她們藝術創作的大工場。她們許多名作，都是事先從此間做足準備才正式開始動筆的。夫人比里維拉年輕很多，婚後不幸在一次車禍中變成殘廢。她是坐在輪椅後才專心習畫自學成功的。至於里維拉不用介紹了，他的壁畫早遍佈世界各地，包括在紐約那驚動過世人，畫有列寧、托洛茨基等人題名<新工人學校>的一幅，也許你們中會有人看過的吧？”我說：“沒有”。但我們已看過里維拉在款拿哇卡(Cuernavaca)可迪士(Cortes)故宮的，和在首都國會大廈裡的一組壁畫。特別是後者，那出名的The History of Mexico—from Conquest to the Future，他足足花了四年，從16世紀西班牙入侵墨西哥、人民經受壓迫的歷史開始，一直畫到未來，無不一一生動細緻地描繪在牆上；更難得的是，在王宮靠左梯旁的最後一幅，里維拉竟在勞動人群中高高畫上了馬克思的肖像。

荷西教授說：“里維拉就是要表達出世人應該學習和追求一個美善而合理的社會遠景，他永遠是用他的腦力和心血去創作他的藝術的。”為要追求一個“美善合理的社會”，不少先烈付出了他們畢生的心血，甚至他們的生命。像當年俄國的列寧和托洛茨基，可說都是其中的表表者。又誰想得到，他們為了這個目的，苦心建立起來的

國際組織，後來竟會變成了史大林的外交工具，他們苦心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工農祖國，今天會完全被糟蹋以至被瓦解的呢！

忽然記起來，我們是1月4日飛來墨西哥城的。76年前恰巧就是同月的同一天，列寧病危寫下遺囑，要撤換史大林總書記的職位。可惜他隨即去世，趕不及對已發覺的危機做到甚麼，改變不了蘇聯與世界往後逆轉的歷史，更救不了一整代革命元勳被殺害的命運。

離開Kahlo博物館，上車不幾分鐘便到了同一馬路的410號。濃蔭下展在眼前的是一座淺綠色的大宅。20呎高牆的右上方，用西班牙文大大的浮批上紀念館的名字：MUSEO CASA DE LEON TROTSKY十分耀眼。我們從髹上紅色的門框進入屋內，售票處一位年青姑娘指著牆上的告示，用肢體語言努力向我們解釋不同的收費。對突然來了這許多黃皮膚的東方客人顯出有點驚詫。我們輪著購票，綠色的門券上印有1920年列寧托洛茨基的合照，設計倒很不俗。荷西教授向我們解釋：這大宅本來也是里維拉所有，當年讓給了托氏居住，今天成了托洛茨基的紀念館，交由一個委員會管理。門券收入祇部份幫補一點經費罷了。

他說：1937年1月，剛好又是今天的前三天，托洛茨基由挪威警察“護航”橫渡大西洋，在這裡北面的Tampico港口登陸。當日里維拉生病留在醫院，是Kahlo親自到碼頭迎接托氏夫婦到考約奧崗的。迪果•里維拉為人正氣磅礴，又深切關注世界的動態，在托洛茨基正一步步遭受史大林迫害，到處流亡，許多西方國家在蘇聯壓力之下，爲了本身利益都不敢收留或招待托洛茨基的時候，就是他毅然把托氏引薦到墨西哥來的。

我們邊說邊行，繞過掛有強烈墨西哥民族特色彩畫的大堂，踏出了花園。那裡樹木扶疏，面積看有6、7百平方米，東北角那邊有兩座平房。教授指著靠右邊兩個空空的木籠說：“托氏生前每天工餘都在此飼養兔子消遣的”。

跟著回頭向我說：“你們可能是第一批由中國前來的訪客，對這位俄國或世界性歷史人物也

許不會太陌生吧？”我告訴他，托氏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是的確引起過極大波瀾的。憑個人所知，托氏跟中國，早在30年代已建立上密切的關係。當年以中共創建者陳獨秀爲首的一批共產黨人，在中國1925-27年革命失敗後都拋棄了莫斯科的路線，接受了托氏的意見，因而被史大林指罵爲“托陳反革命集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在毛澤東對蔣介石妥協的西安事變之後，與史大林對希特拉妥協的<德蘇協定>之前，史-毛就曾經在中國聯合發動過一場非常凌厲的，全國性的反托運動。我清楚地記得在那段日子裡，中國沿海各大城市都貼滿了<打倒托匪漢奸>的標語。那個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明白到底是甚麼的一回事。

我們從花園先轉到北面一幢長方形的房子，這裡兩通間大大小小掛滿了幾十幅托氏生平的照片。據說這些照片，祇是托洛茨基歷年顛撲流離，微幸殘存下來的一小部份。其中多多少少也反映出，托氏在每個不同歲月裡的不同風采；也顯示出他在各個不同歷史關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入門左邊陳列了托氏的一座塑像。那邊廂還有一幅紅軍統帥英姿的漫畫，是丹尼(Deni)的作品。照片按著年份排列，當然也保存有托氏童年的，以至他妻子娜塔麗婭及兒女們的。此外也包括了一部份西方報刊登過的，關於托氏在各地流亡的，以及當年他遇害後在此地隆重葬禮的圖片。

老嚮導回過頭來問我：“在中國也有許多信仰托洛茨基的人嗎？”我告訴他：“相信人數不會很多。祇知道他們長期受到國民黨(包括日本佔領時期的汪精衛傀儡政權)和共產黨的迫害，特別是到了1952年毛澤東在世時的一次大搜捕中，差不多全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份子，都全部被關進共產黨的監獄裡去了。”

朋友們一個個正在細心讀著室內每張圖片的說明。教授跟我卻不期一齊發出了同樣的感慨：權力怎麼會把人變得如此瘋狂！史大林得到權力後，把整整一代老布爾什維克同袍斬盡殺絕，更不惜

派人遠渡重洋也要把不同政見的對手消滅；在中國，毛澤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何嘗不又同樣是爲了權力，把幫助他走上政權的戰友，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都一個個鬥倒整死呢！

大夥兒步出了展覽室，拐到東邊的一座房子便是托氏起居的地方。進屋後穿過一個客堂或飯堂到了托氏的書房—亦即老人每天在此消磨最多時間的工作室。我呆呆地站著忽然感到一陣寒意。對了，記得我從中文譯本的圖片中也曾見過：就是在這張書桌旁邊，59年前，史大林經過精心設計派來的GPU兇手，在這裡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的。

“房中桌椅書籍文具擺置依然”，荷西說：“一切都盡量保持著原有的狀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的日子，特別是經過5月24日他們的襲擊失敗後，托洛茨基早已預感到，史大林是決心一定要盡快把他殺死的。所以墨西哥和美國的朋友們，正爲此合力加強這寓所的防衛工程：像圍牆，碉樓，警鐘系統，及重新裝換所有窗戶等等。”他指著全屋子特別加厚的鐵窗向我們嘆了口氣說：“托氏本人極無奈這種<鐵窗>生活，可不幸即使盡了最大努力，也一樣保不了這位老人的生命！”

書房的左邊掛著一幅墨西哥地圖，牆角一個箱子旁邊放著托氏的手杖，箱子上面擺置著的是他兒子西道夫的塑像。這個被他父親稱爲“朋友與戰士”的兒子，也是在托氏本人遇害前一年，給蘇聯特務在巴黎的醫院裡毒斃的。

荷西說：“那邊還可看到一位美國青年人的碑石，他名字叫Harte，才25歲，自願前來做托洛茨基的衛士，就是在五月的襲擊中犧牲的。”他指著書櫃和書架对大家高聲說：“這裡保存的部份是托氏的著作，也有不少是當年俄國與國際間重要的歷史文獻與資料。”他說：“現在世界各國許多出名的圖書館裡，都有托洛茨基的著作，其中最大量，又最齊全的應當是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了。這無疑是留下來研究近代史的一份極其珍貴的遺產呢！”

我告訴他：“托氏著作的中譯本，大大小小總有超過30本以上，在香港一些書局可以買到。最近中國國內更公開發行了伊薩克•多伊徹(Issac Deutscher)的巨著<先知三部曲>(Trilogy of the Prophet—托洛茨基傳)的中文版呢。”

出了書房，荷西帶衆人轉入了托氏的寢室。我們在右邊靠浴室的牆上，赫然看到十多個大小不同的牆洞，那就是5月24日瘋狂射擊留下的彈痕——史大林的罪證。教授說：“當日燃燒彈對準書房和寢室，目的顯然不單要毀滅托氏的生命，同時也要毀滅托氏手上的這些資料的；這些資料，特別在簽訂了<德蘇協定>之後，對史大林非常不利。”教授的話令我想起，做壞事的人多份是懦怯的。怪不得中國“四人幫”的江青得勢時，也要著令她的同謀張春橋，快快在上海毀滅掉所有對她不利的早年資料了。

跟著各人又再步出花園，就在右邊不遠便到了托洛茨基的墓地。陽光透過樹葉，灑在一塊長方形刻有鐮刀斧頭標誌的墓碑上。這時大家靜默下來。我心裡卻在沉思：好得歷史永遠是公道的，就像墨西哥這裡的依士德嘉(Las Estacas)清泉一樣，儘管迂迴曲折，可它永不停留。如今，蘇聯的甚麼“莫斯科黨案”，中國的甚麼“托匪漢奸”，所有史毛泡製的歷史冤案都一一大白於世，連帶使蘇聯也瓦解了。

這不已充份證明：官僚主義的罪惡，“一國社會主義”是鑄定要失敗的嗎！所有那些史大林，壽西斯古，包括毛澤東，巴爾布特……之流，他們跟真正的社會主義都沾不上一點關係。看來難怪世人今天又在重新探討托洛茨基主義，中國國內又在熱烈研究起陳獨秀來了。

回顧資本主義世界，根本想不出任何辦法解放人類經已達到、而且早可更高發展的生產力去解決貧窮。現在科技的高度水平，和電腦的普遍應用，早給社會主義提供了足夠的先決條件。人類一定會在痛苦的經驗中認清遠景，重拾信心，再作奮鬥；地球上一個嶄新的經濟制度，遲早要而且會徹底消滅金融風暴、失業危機，在合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托洛茨基，你安息吧！

這裡沒有人哭，沒有人笑，我們默默離開紀念館。回頭仰望墓園裡今年未見結果的橘子樹，祇見它根強葉茂，還是生氣勃勃的。可就像今日負債壘壘的墨西哥，如果這合理改變過來，難道她不會有一天也開花結果，繁榮富強過來嗎？

四週的雀聲起著回應，我們離開了托洛茨基紀念館，我們的車子繼續向東邊的‘普愛罷啦’(Puebla)出發。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三）

第十章 托洛茨基與猶太人問題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相信，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鞏固，必然會導致猶太人的解放。它也無可避免地會導致他們的同化。猶太人會被吸收到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中去。不再會有猶太人問題了，猶太人問題只會被併入到資產階級的較一般的問題中去。〈1〉

到底有多少被解放了的猶太人仍然認為他們自己是猶太人，就完全要看反猶太人主義的剩餘還有多少了。〈2〉只要被同化了的猶太人不被社會某些部份接受為享有同等權利的平等成員，他們就會保持他們的猶太人身份。但是這種反猶太人主義，主要是生根在貴族、教會和軍官群〈他們也來自貴族〉之中，而且有前資產階級、半封建的特性。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進展，這種反猶太主義也會消失的。

猶太人會被同化、反猶太主義之作為一個前資產階級現象注定會消失的觀點，無疑地有一個理性的中心部份。〈3〉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六十五年中，半封建的沙皇俄國是唯一有公開反猶意識和實踐的歐洲大國，這一事實證實了以上這個觀點。可是，猶太人的解放過程，在那些有了人民群眾運動所支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荷蘭、英國、法國、美國）中，是與在像德國、奧地利那樣，革命是“從上面”來的國家中極為不同的。在後一類的國家中，猶太人的解放是從上面引進的，只在以後才被取銷。〈4〉

但是，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大部份是由於考茨基的影響，帶有強烈的機械的經濟進化論的因素。它也是建基在對猶太人人口的社會構成較簡單化了的印象上的。就這點而論，它的態度是半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多於馬克思主義成分。〈5〉

沙皇俄國和奧匈帝國（加利西亞、斯洛伐克）都有人口眾多的貧窮猶太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沙俄（特別是它的波蘭部份）、薩洛、阿姆斯特丹、倫

敦和紐約，都有人口眾多的猶太無產階級。在所有這些地方，它在創立近代勞工運動方面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6〉考茨基和他的門徒們大都不瞭解這方面的猶太人問題。伯恩斯坦、倍倍爾、羅莎·盧森堡和格拉姆西等人的態度比較有伸縮性，不過還是有限。

這種不合適的理論導致實踐時發生差錯。當法國社會真正地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為兩部份的時候，以合厄斯德為中心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們嚴格地保持中立。照他們的看法，這只是資產階級不同派系之間的衝突。〈7〉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品還含蓄著反猶太主義的音調。〈8〉在某種程度上，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應該對反猶太主義在奧地利工人階級中比在德國工人中更普遍、因而造成在【1938年納粹德國對奧地利的】併吞時期的悲慘結果的事實負責任。

當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要解決它的猶太人口的地位問題時，它在猶太共產黨員（the Jewsektia）的壓力下，選擇了一個介於同化和承認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之間的解決方法。〈9〉在俄國，只有猶太人被宣佈為沒有自己領土的族群。〈10〉雖然與被給以自治區或自治共和國的許多其他族群比較起來，猶太人在數量上較多、居住的地域較集中，而且有較高水平的文化均勻性，但是，他們卻不被給以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可是他們的護照和身份卡卻說他們的族裔是猶太人。這個半吊子的解決方法的兩面性，在客觀上卻使以後的納粹更容易去組織他們的滅絕運動。

只有進入老年的恩格斯和羅莎·盧森堡才設法從考茨基為猶太人問題所設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中，恩格斯開始熟悉在德國宮廷附屬教堂牧師斯特克和奧地利維也納市長盧埃格爾周圍日漸增大的反猶太主義群眾運動。他認識到，這個反猶太主義是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動機和利益的思想所混合的結果。這個思想不但可在

貴族、教會和軍官群中、而且可在貧窮化的中等階級和遭受猶太人競爭的自由職業人士中找到。

恩格斯對只是譴責反猶太主義為“愚蠢人的社會主義”並不滿意。〈11〉他意識到，西方有一個意義重大的猶太無產階級，他們的鬥爭必須得到支持(他一點都沒有說到東歐的猶太人)。他可能受到馬克思的女兒埃利諾的影響，因為她說：“我最快樂的時光是在與倫敦東區猶太工人們一起的時候。

“〈12〉恩格斯也承認，倫敦東區的猶太工人是英國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者之一。猶太裁縫、麵包師傅和鞋匠曾三次發動罷工，要求他們的14—16小時工作日減至12小時。

羅莎·盧森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中所發生事情的影響之後，走了更前一步。她認識到，對猶太人政治權利的限制，或者對猶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猶太資產階級在內，一般說來就是對民主權利的攻擊。〈13〉因此，這些反猶太主義傾向，不應該被看成為前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心態的表現，而應該被看為現今的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應該加以有力地反對。〈14〉列寧在1914年為了取消一切對猶太人權利的限制，為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派改寫了一份法律草案。他在對這個草案的說明中寫道：

“黑色百人團【一個極右派的武裝團隊】正在進行充滿了仇恨的鼓動反對猶太人。【國家杜馬中極右派領袖】普里什克維奇的跟從們正企圖使猶太民族成為他們自己的不端行為的替罪羊。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團派在它的法律草案中如此突出了對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的任意迫害。”〈15〉

在第二、第三國際的所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中，只有托洛茨基把羅莎·盧森堡和恩格斯對猶太人問題的正面意見擴展為不怎麼簡單、不怎麼機械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達到這種態度的背景是他在以下這些事件中的經驗：年青時所體會到的黑色百人團與反猶太主義、對1905年革命的集體迫害和1913年著名的伯利斯案件。〈16〉他在那個時候還沒有拒絕接受考茨基的猶太人不構成一個民族的論點。但是他從小就對不正義的事情特別反感，所以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要抗議。我們在他早期對猶太人問題的著作中看到比在考茨基、維克托·亞特勒、奧托·鮑厄爾、或者甚至列寧、盧森堡等人的

著作中對於反猶太主義的受害者更大的團結感。

在這同時，他被在沙皇統治下所目睹的野蠻主義深深地激怒。他在黑色百人團的大屠殺、謊言、暴行和伯利斯案件的不公正中看到這個野蠻主義的表現。向迫害者進行反抗、向被迫害者認同：這就是對猶太人問題採取新態度的推動力。這個新態度是超出了已被恩格斯、盧森堡所實現了的。

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及隨後的內戰中，托洛茨基的態度中的內在矛盾變得更清楚了。〈17〉他個人沒有介入關於猶太人地位的爭論。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段時期，猶太人問題不是他的鼓動的一部份。他也没有介入黨內關於Jewsektia(猶太人小組)所建議的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沒有領土的民族的爭論。但是，與其他猶太裔的俄羅斯革命領導者不同，他越來越意識到他自己的猶太根源和相當數量的俄國人民對這個事情的政治反應。

托洛茨基毫無疑問地是國家和黨的第二把手。他是紅軍的毫無疑問的領導人。因為托洛茨基的猶太血統，反革命對他的仇恨，甚過對契卡【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的音譯】領導人澤爾任斯基。反革命的最反動派系，利用托洛茨基的血統，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落後部份中，挑起真實的或潛在的反猶太主義，以反對革命。就是因為這一點，托洛茨基拒絕擔任國家的某些職位。〈18〉列寧在1922年10月26日的中央委員會上，建議托洛茨基擔任等於列寧所指定的國家首腦繼承人的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位，但是托洛茨基以他的猶太血源為理由而謝絕了。

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寧在內的其他革命領導者們更知道積極反猶太主義的潛在恐怖。〈20〉沙俄時代在烏克蘭佩特柳拉地區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由於有超過十萬無辜受害者，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兒童、老人(是納粹大屠殺之前猶太受害者人數最多的一次)，是一個令托洛茨基痛苦而難忘的震驚。他以堅定的決心懲處這些殘暴的犯罪者，決不讓他的猶太血源或者反革命會利用這件事來反對他這個事實，阻止他對反革命的堅苦鬥爭。

與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托洛茨基希望蘇聯的新社會關係、公共教育和主導思想會導致反猶太主義的偏見和行為逐漸減少。斯大林派在開頭先是隱蔽地然後日漸系統化地使用反猶太主義來對

付反對派，這個事例已是對托洛茨基的一個重大打擊。〈21〉接著，在蘇聯的大清洗時期，就是官方與傳統的反猶太主義的增加。(22)這個反猶太主義的最壞表現，是在希特勒——拉伐爾條約時期，以後又在1950年到1953年的“醫生陰謀”時期。(這些醫生其中多數是猶太裔，被控告謀殺日丹諾夫、密謀殺害政府高級官員)。

在這整段時期中，斯大林破壞了蘇聯的猶太文化。也在這整段時間中，在向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藉口下，反對猶太主義的宣傳品得以廣泛地流傳。這種與布爾什維克傳統的決裂，它的長期的悲慘後果，在今天仍然明顯。〈23〉可是，蘇聯的這個日增的反猶太主義，與正開始在歐洲展開的悲劇比較起來是小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益增多的反猶太主義團體，最後分析起來，是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產物。但是，當德國的納粹黨利用恐怖手段來實現德國大企業、德國統治精英的國家和國際的目標、贏取了群眾基礎和大量選民的支持以致使它成為權力的一個有效工具的時候，以上的發展，就達到了一個在性質上嶄新的階段了。希特勒在這時候就利用了政治和技術方法來實現他自己特有的意識形態，一種以生物學上的種族主義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24〉最遲從1939年開始，這個目標是滅絕種族的大屠殺(genocide)。

隨著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的進攻，希特勒在這時候已準備好有系統地實施這個政策。〈25〉托洛茨基非常明白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納粹第三帝國的謀殺動力和歐洲猶太人的命運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正如猶太人的解放象徵了公民權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歷史性發展，現在對猶太人公民權的限制和取消卻以相當集中的方式表達出自從1914年以來的反動的歷史發展。

《托洛茨基自傳》的最後一章的標題是“沒有簽證的星球”。他在1940年5月所寫的關於戰爭的宣言中也用這片語來描述歐洲猶太人的情況。〈26〉世界各國政府在1939年所舉行、被納粹所輕視的伊維安會議只向千千萬萬受威脅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幾百張旅行簽證。〈27〉當時所需要的，當然是大規模地撤退歐洲猶太人。

托洛茨基知道，法西斯主義、半法西斯主義政權在歐洲的出現會使各帝國主義之間加緊進行霸佔

世界的競爭，而這種競爭也會意味著對歐洲猶太人的肉體毀滅。他在1938年的“向美國猶太人呼籲”的文章中寫道：

“想像一旦世界大戰爆發猶太人會有怎樣的遭遇是不難的。可是，即使沒有戰爭，正在發展中的全世界的反動也一定會導致猶太人的滅絕。”
〈28〉

這個確信最後促使托洛茨基改變了他對猶太人問題的一個決定性的立場。從1937年開始，他承認猶太民族至少在那樣的地區中有權利組成它自己的國家。在這些地區中，它構成一個獨立自足的、有它自己語言的人口。他在1934年就已經寫道：

“工人政府必須為猶太人，像為所有其他民族一樣，創立能使他們的文化向前發展的最好條件。對於那些要求這樣做的猶太人而言，這就意味著建立他們自己的學校、他們自己的報刊、他們自己的劇院，以及由他們自己管理的領土。這就是無產階級成為地球的主人後的做法。對民族問題不將會有何任何限制。相反地：對所有民族、所有種族的一切文化需要都將會有物質協助。如果這個或那個民族團體預定要消失(成為一個民族)的話，這只能是自然過程的結果，不能是任何在領土上，經濟上或行政上的困難的結果”。〈29〉

三年後，他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關於猶太人問題，首先，我可以說，它不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內解決，也不能夠用猶太復國主義來解決。有一段時候，我以為猶太人會同化在他們在其中間生活的人民和文化。這在德國，甚至在美國，就是如此，而且為了這個理由，是可能作這種預測的。但是現在，是不可能這樣說了。…”

“領土的問題是有關的，因為當大群人民緊密地住在一起的時候，實行經濟和文化的計劃是比較容易。

“這對文化的發展是必要的。如果猶太人渴望這點的話，社會主義就沒有權不讓他們得到它”。
〈30〉

雖然托洛茨基改變了他對領土問題的立場，這並沒有使他改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完全排斥。〈31〉我們頂多只能從這個分析作出這樣的結論：他不會反對在巴勒斯坦說希伯來語的少數民族有有

限度的國家——政治自治的權利。〈32〉

托洛茨基的公式十分正確地將重點放在相關的民族，種族團體選擇的自由上。就1918年至1923年的蘇維埃俄國具體情況而言，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半島說意第緒語的人口可能會選擇成立猶太國家，而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也許在基輔、敖得薩、哈爾科夫等地說俄語的猶太人會反對這個做法。〈33〉但是後者可以自由選擇居住的地方，而且不會被迫攜帶寫上“猶太人”的護照。這可能會是對“保存民族性或同化”這兩者之間改變對立的一個正面解決方法。

托洛茨基對近代反猶太主義的分析和他之承認各獨立自足的猶太人族群有作為一個國家而在領土和政治上安全存在的權利，構成了一個前後一致的整體，代表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上向前走了決定的一步。〈34〉我們並不聲稱，這是歷史唯物論對猶太人問題的最後看法。在這個問題上，像在任何其他的歷史爭論上一樣，可能是沒有最後看法的。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的立場仍然有一些弱點，其中一個是他低估了在反猶太主義的持續中和其實是在猶太人身份的殘存中的文化和宗教的因素。〈35〉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羅丹森和納克特曾經正確地指出這些弱點來，其他歷史學家也曾這樣說過。

托洛茨基的分析中的這個弱點使人更為驚奇，因為這個文化和宗教的因素是思想和社會一經濟現象非同步性的另一個例子。正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所看到的，這個思想和社會一經濟現象的非同步在他處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的時候曾經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總的說來，托洛茨基對猶太人問題的分析，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成就相比，包括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在內，代表一個質的進步。不使人驚奇的是自從托洛茨基逝世以後，大多數對猶太人問題的重要馬克思主義貢獻來自我們可以稱之為托洛茨基的學生的作者：里昂的《對猶太人問題的唯物主義解釋》，多伊徹的《歷史上非猶太裔的猶太人》，旺斯托克的《貧窮中的麵包》，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特拉偉索的《馬克思主義與猶太人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這段時期，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發展。似非而是的是，這個發展似乎證實第二國

際的原先分析。除了以色列以外，由於納粹大屠殺和戰後擴張長波的綜合結果，主要的猶太人集中區(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普遍地有了非無產階級化的現象。極大多數的猶太人口被同化於中等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之中。甚至在以色列，猶太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於阿拉伯工資勞動者而言，已經變成為勞工貴族。

幾十年來，納粹大屠殺的創傷的心理和政治的結果，和非猶太人口因此而來的犯罪感，都在歐洲和北美洲產生使反猶太主義者邊緣化的效果。以色列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在結構上之依賴美帝國主義，也對猶太人的思想和政治的發展發生影響：猶太人口普遍地向右轉。他們不再是激進左派政治的傳統的徵募地了。

但是自從1980年以來，這個發展已經停止了。隨著貧窮和不確定情況在西歐和北美的普遍增長，隨著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崩潰所產生的可怕社會後果，反猶太主義已重新開始滋長。在經濟的衰退中，許多猶太人團體正經驗到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再向上移動了。這個傾向到底有多大，是很難預測的。以色列的復國對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提供不了解決方法。

自從1941年以來，前後一致地爭取人權、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太主義和歧視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們，也許會首次在再度受到這個社會威脅的猶太人群中，找到同情的傾聽者。

註釋：

- 〈1〉 見收集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哈蒙茲沃尔思 1975 年版)中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
- 〈2〉 (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的一位已被同化、並與一位信天主教的婦女結婚的猶太人初級律師在一次訪談中說道，如果世界上還有一位猶太人受迫害或壓迫，他就仍會認為 he 自己是猶太人。(《Zeit—Magazin》報，1990 年 11 月 23 日)。
- 〈3〉 十九、二十世紀有各種各樣的例子說明，住在熱情友好環境中的猶太人，經過三代的異族通婚，就會慢慢失去他們的特殊身份。
- 〈4〉 Walter Grab, 《猶太人解放的德國方法 1789 年—1938 年》，慕尼黑 1991 年版。

- 〈5〉考茨基在其一生的政治發展中，從來沒有完全切斷在達爾文主義(機械進化論)與歷史唯物論之間的臍帶。
- 〈6〉見旺斯托克的《貧窮中的麵包》(巴黎 1984 年版)一書中“猶太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文。
- 〈7〉這個態度也可在馬克思主義期刊《Neue Zeit》(《新時代》)中找到。該期刊的一篇文章把反猶太主義等同於親猶太主義，因而宣佈對這兩者嚴格地保持中立。這就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亞特勒的立場。若雷斯因熱情地為德雷福斯辯護才挽救了法國社會黨人的聲譽。
- 〈8〉Leopold Spira, 《猶太人是有罪的》，維也納 1978 年版。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非常壞的反猶太主義的例子。巴枯寧是一個惡毒的反猶太主義者，烏克蘭的農民運動領導人馬赫諾也是。
- 〈9〉俄國共產黨的猶太人小組的名稱是 Jewsektia。1918 年 1 月，一個專管猶太人事務的人民委員部(Commissariat)成為在斯大林所主持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之下的一個部門。“當 Jewsektia 在猶太人圈子中壓制了所有反對者之後，它於 1930 年被解散了”。(John Bunzl, 《海外猶太人中的階級鬥爭》，維也納 1975 年版)。
- 〈10〉蘇聯的形式上的國家主席加里寧在 1934 年承認，猶太民族是唯一沒有自己領土的民族。他那時正企圖為在遠東設立一個猶太人自治區而辯護。它的首府是比羅比姜。這是一個沒有猶太人居住的地區。這就成為一個避免在猶太人真正聚居的蘇聯西部給他們一個自己管理的共和國的方法。托洛茨基稱比羅比姜為一幕“官僚笑劇”。
- 〈11〉“愚蠢人的社會主義”這段話原先是倍倍爾說的。恩格斯於 1881 年給伯恩斯坦的信中寫道，他從來沒有讀過像反猶太主義的作品那樣愚蠢、幼稚的東西(馬恩全集，第 35 卷，第 214 頁)。九年以後，他在一封給《維也納工人報》(1890 年 5 月 9 日)的信中嚴厲地譴責了反猶太主義(馬恩全集，第 22 卷，第 49 頁)。再一年以後，他在一封給倍倍爾的信中表示高興地見到許多猶太人在反猶太主義的壓力下參加社會民主主義(馬恩全集，第 38 卷，第 228 頁)。
- 〈12〉Chushichi tsuzuki, 《埃利諾·馬克思的生平 1855—1898》，牛津 1967 年版。
- 〈13〉大多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忽略了馬克思的文章“論猶太人問題”中一個雙重意義。他不但說，社會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將會是社會從猶太人之作為大企業一個構成部份中解放出來，他也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猶太人的解放將會是一般解放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政治解放，或者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每個公民有平等權利，是進步的。
- 〈14〉關於法國社會主義者們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採取的反對反動的鬥爭，羅沙·盧森堡在 1900 年所寫的文章“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危機”中著重地說了以下的話：“若雷斯是對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國激起了所有潛伏的反動勢力。軍國主義這個工人階級的老敵人被暴露了，而且所有的武器必須被用來反對它。工人階級第一次被號召起來進行大的政治鬥爭。若雷斯及其朋友們領導他們進行這個鬥爭，因此在法國社會主義史上開展了一個新時代。”倍倍爾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反對猶太主義，而且在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對“一切緊急法令、一切形式的政治和社會壓制”都反對(倍倍爾, 《與恩格斯的通信》，海牙 1965 版，第 101 頁)。可是，他有這樣的幻想：在反猶太主義的選民的底層中有一群在社會活動上進步的人們，這一群最終會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亞特勒及甚至德國共產黨一度都有這個幻想。這是一個悲劇的錯誤。
- 〈15〉《列寧全集》，第 20 卷。
- 〈16〉伯利斯是一位年青猶太人。他在 1913 被控告謀殺一位兒童為一個秘密儀式獲得血液。雖然他在初審與重審中都被判無罪，沙皇政府卻拼命證明在某些儀式中猶太人是用了基督徒的血的。當戰爭在翌年爆發時，警察和軍隊馬上開始對猶太人行動。托洛茨基論伯利斯事件的文章登在 1913 年第 9 期的《新時

代》上。見納維《托洛茨基與猶太人》(費城 1971 年版), 和西格爾的《托洛茨基的悲劇》(Harmondsworth 1983 年版)。後一本書包含了對前一本的批評。

- 〈17〉這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討論民族問題的那一章中變得非常明顯。他起先在他所列的被壓迫民族的名單上沒有提到猶太人, 雖然猶太人的數量多於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但是他在後面卻寫道: “這個形式上的權利的法律數目已達到 650”(第三卷第 42 頁)。所以他們明顯是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托洛茨基也單單注重猶太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 完全忽略了猶太人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的存在。
- 〈18〉見《托洛茨基自傳》, 紐約 1960 年版, 第 340 頁。
- 〈19〉見丹尼洛夫在《歷史工作坊期刊》(牛津 1990 年版)中的發言。
- 〈20〉在 1918 年至 1920 年之間, 作為紅軍領導人的托洛茨基比任何其他革命領導人更多地在他的傳奇性的火車上走遍全國各地, 更了解到人民的、特別是中、小農的心境。
- 〈21〉他在 1926 年 3 月 4 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表達了這一點: “反猶太主義的煽動能夠不受懲罰地在我們的黨內、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繼續活動是真的、可能的嗎?!”(引自伊薩克·多伊徹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牛津 1970 年版, 第 258 頁)。
- 〈22〉托洛茨基, “熱月反動與反猶太主義”。這篇文章被註以 1937 年 2 月 22 日的日期, 也首次發表在 1937 年 2 月 22 日的美國雜誌《新國際》上。Jean—Jacques Marie 指出, 在 1926 年蘇聯的猶太人(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已經佔蘇聯幹部(官僚)的 25%。在 1939 年, 40%的猶太家庭之主是幹部, 而平均蘇聯家庭之主只有 17·2%是幹部。所以在斯大林的眼中, 這些事實使蘇聯猶太人容易成為人民對官僚層仇恨的替罪羊(《斯大林的最後陰謀》, 布魯塞爾 1993 年版, 第 212 頁)。
- 〈23〉關於今日俄國人的反猶太主義, 見曼德爾的《Beyond Perestroika》(《超越了改革》), 倫

敦 1989 年版, 第 18—20 頁。

- 〈24〉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應該與極端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
- 〈25〉單單就人數而言, 帝國主義者在印度鎮壓的受害人數和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中國實施集體恐怖的受害人數是等於、如果不是多於納粹種族滅絕的猶太受害者的數目。不同之處是英國或日本的目標都不是謀殺所有印度人或所有中國人。希特勒的目標卻是謀殺每一個猶太男人、女人和兒童。辛地人(Sinti)和吉卜賽人也受到滅種的威脅。
- 〈26〉《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 在《托洛茨基文集 1939 年—1940 年》(紐約 1973 年版)中。
- 〈27〉猶太復國主義者 Ben Gurion 和 Naum Goldmann 也都預料到納粹會進行大屠殺。見 David Ben Gurion, 《以色列, 一部親自參與的歷史》, 特拉維夫市 1972 年版第 50 頁。
- 〈28〉托洛茨基的《向美國猶太人呼籲》一文是在《托洛茨基論猶太人問題》(紐約 1970 年版)一書中。
- 〈29〉同上。
- 〈30〉《訪問猶太日報〈前進〉》一文是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 1936—1937 年》上, 紐約 1970 和 1978 年版, 從第 102 頁開始。
- 〈31〉見托洛茨基的《到巴勒斯坦的旅行》一文(1939 年 2 月 14 日)。該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補篇 1934—1940 年》, 第 827—828 頁。
- 〈32〉以色列的托派主張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Zionist State)轉變為兩個民族共居的巴勒斯坦(biznational Palestine)。
- 〈33〉也見於 Nora Levin, 《1917 年以來的蘇聯猶太人》紐約 1988 年版。
- 〈34〉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 對於住在較大區域、人口雜居的各民族而言, 聯邦主義是最好的一唯一可能的一解決方法。
- 〈35〉宗教與文化傳統並不是等同的。例如印度的猶太人雖然有相同的宗教, 但是由於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的傳統, 所以不能結合成一個民族。

歷史的教訓和理論

——在蘇聯崩潰後討論蘇聯性質的各個理論問題

謝波德著 兆立譯

對於十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崩潰，工人運動中的所有派系和世界資本家階級的政治代表們都覺得它來得太突然。沒有人在1989年之前預料到這樣一個後果——那就是，沒有一個現仍活著的人能預料到。為什麼會這樣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檢討一下關於蘇聯的性質的不同觀點，會是有用的吧。

前蘇聯是否社會主義社會

斯大林及其後繼者們聲稱，蘇聯已在1930年代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了。

這個政權聲稱，“我們當然還沒有完全實現共產主義，但是我們已經實現社會主義，那就是，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1〉

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而言，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最低階段，將會在資本主義科技成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將會從那個基礎開始，快速地發展生產資料，使勞動生產力的水平提高到超越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

革命卻在歐洲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但是沒有能夠擴展到先進歐洲國家去。孤立在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蘇聯，不管它有了多大的進展，一直沒有能夠達到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力的水平。

蘇聯的產品質量差，不能夠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它在不斷的軍事威脅下，被迫將極大部分的生產，專門用在軍事上。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它是一個相對地物資短缺，因此是不平等的政權。物資短缺與不平等，導致一個在經濟上享有特權的官僚層的產生。

列寧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不久，寫了《國家與革命》一書。他援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以下的句子，來回答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之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消亡的概念：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是所有機會主義者們所重複說的。但是，他們‘忘記’加一句話：首

先，根據馬克思，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正在消亡的國家，那就是說，一個如此組成以致立即開始消亡、不得不消亡的國家。”

這個社會主義準則確實從來沒有在蘇聯實現過——這個國家迅速地變成一個巨大而醜陋的東西，一點都沒有顯示要消亡的樣子。

列寧進一步解釋，“工人們在取得政治權力之後，將會猛擊舊的官僚機構，從根本上粉碎之，而且徹底地將它摧毀；他們將會代之以一個同一工人們和其他僱員們組成的新機構。為了防止這些人轉變為官僚，以下的，曾由馬克思、恩格斯所明確、詳細地規定的措施，將會立即被採用：(1)不但要有選舉，而且可以隨時罷免；(2)薪金不應超過工人的工資；(3)立即推行由全體人來管理和監督，以致每個人會在某時候變成‘官僚’，因此沒有人會變成‘官僚’。”〈2〉

蘇聯卻朝著相反方向走。那末，蘇聯的崩潰對於它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問題，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官僚層(bureaucracy)本身——有一些人稱之為權貴們(nomenklatura〔譯者註〕——現在相信，資本主義比它以往稱之為‘社會主義’那個東西優越得多。它的成員都要千方百計地以個人身份變成資本家。

第二，蘇聯在一槍未發之下，即從內都崩潰，其不光彩之處，就是它尚未實現社會主義的最明顯的証明，因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在性質上比資本主義優越的制度。如果蘇聯真正已經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它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會在資本主義崩潰之前即崩塌了。這裡的一個重要結論是，蘇聯的崩潰不是社會主義的崩潰。

對蘇聯性質的三種意見

這就剩下在工人運動中佔少數的幾群人的觀點了。這群人的起源，都是托洛茨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他們都是在1920年代後期被開除的。由於這個背景，特別是

在1939年的斯大林——希特勒協定之後，發展出三個互相對立的關於蘇聯性質的理論。這三個理論導致三個對立的政治立場。

一個觀點是，蘇聯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a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近幾十年來，世界上持這個立場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團體是現已去世的湯尼·克利夫(Tony Cliff)所領導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它在其他國家的同盟小團體。

另一個理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未被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所預見的新形式的階級社會。提倡這一個理論的人們稱之為“官僚集產主義”(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根據這個觀點，官僚層是一個以新方法來剝削勞動人民、工資勞動者和農民的新統治階級。

持這個觀點的人美國最多。他們從1940年代開始即由夏克曼(Max Shachtman)所領導的組織所代表。這個組織在1950年代溶解到社會黨——社會民主聯盟之中以前，曾有過各種不同的名稱，而且迅速地向右轉。

許多有這個觀點的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一定要支持，因為它與官僚集產主義相比是較少邪惡(lesser evil)——這就是夏克曼及其支持者在越南戰爭中支持華盛頓的主要論據。

一個從夏克曼的組織中分裂出來的左派，在德雷珀(Hal Draper)的領導下，拒絕接受夏克曼的右傾路線。自從1960年代以來，這個派系也許是對“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貢獻最大的派系。今天它是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社”(Solidarity)的一個組成部份。

第三個理論是托洛茨基的理論；先前的兩個理論都是為了反對托洛茨基的這個理論而發展出來的。這個理論認為，從斯大林統治時代開始，蘇聯已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

在一方面，這個社會以扭曲的形式保持了1917年俄國革命在社會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國家對對外貿易的控制，和一個獨立於資本主義貨幣市場的貨幣制度。在另一方面，官僚層在政府、共產黨和工業管理部門之內已奪走了工人和農民的一切政治權利。

蘇聯是一個“官僚墮落的工人國家(bureaucratically 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那就是說，蘇聯一直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一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政體(regime)。

在幾個傾向之間最尖銳的爭論發生在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尖銳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德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

的時候，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們毫不含糊地站出來號召保衛蘇聯。“新階級”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蘇聯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保衛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類似的分歧也發生在朝鮮、東歐、中國、越南、古巴、甚至冷戰本身等等問題上。

依我們意見，在以上幾個國家中，古巴問題應該分開來看。但是國家資本主義建議者們認為，古巴也是國家資本主義。官僚集產主義的建議者們認為，古巴也是官僚集產主義。兩者都認為古巴的政權應該被推翻。

我們不認為古巴是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我認為古巴是一個工人國家，它的以卡斯特羅為中心的領導層是革命社會主義領導層，應該受到我們的支持。

所有這些分歧都在蘇聯集團崩潰之前的數十年中完全記錄在文件中，而且透徹地爭論過。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重複那些爭論，而是根據這個崩潰來重新檢驗這三個理論。如有人對那些爭論感興趣的話，可以參閱過去的文獻。

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

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共和國中企圖資本主義復辟，或者依照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們的說法，倒回“正常”資本主義的一個令人吃驚的特徵，是國有化工業的私有化的途徑。

幾乎所有評論家都注意到，私有化的最大困難在於資金的缺乏。在《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2000年2月號上的一篇標題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俄國和中國的原始積累”文章中，作者霍姆斯特羅姆(Nancy Holmstrom)和史密斯(Richard Smith)指出，“〔蘇聯的〕權貴們集體地控制生產資料，並沒有私人地擁有這些生產資料。所以，〔新資本家〕階級一定要被創立起來。”

這兩位作者在提到哈佛大學的一位在蘇聯崩潰之後指導俄國人如何進行全盤、迅速地私有化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ery Sachs)的時候，寫道：“薩克斯為這個過渡所擬定的方案並沒有提到強盜貴族或流氓資本家。對抽象的、非歷史性的模式盲目地崇拜的薩克斯以為，一旦新聞有了自由，一旦私有企業被合法化，‘資本家’就會出現，就會蓬勃地發展，就會指揮經濟。但是，那些資本家從那裡來呢？在1990年的東歐或俄國，沒有人在生產資料方面擁有大量錢財或財產。沒有資產階級——連一個可把經濟交還的革命前資產

階級都沒有。波蘭有這麼一個笑話：‘他們怎麼辦？——把列寧造船廠交還給列寧家人嗎？’所以沒有人有錢去買工廠、礦場、林場、集體農場，或者雇用工人。”

這兩位作者繼續指出：資本家“…必得要被創造起來。個人必須取得財物，把財產、工廠、礦場、油井、林場私有化。但是，因為沒有人有錢向政府購買這些國家財產，所以沒有可行的辦法能使這種事情按照法律、合於法律或者合於道德地去做。這個階級不得不幾乎要在一夜之間被培植起來。所發生的就是這樣。到最後，地下黑手黨成員、權貴們特別是某些工業的高級經理部門和一部份知識份子——這些人被特別地徵募去，以犯罪的手法，將經濟私有化。”

換句話說，沒有足夠的、擁有充足資本的人們能夠全部買下前國有化工業。這對於這些國家原來就是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理論，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國家資本主義”這幾個字真正有涵義的話，它應該意味著，在蘇聯，正像在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形式之中一樣，資本積蓄早就應該發生了。如果資本積累在這個國家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了，那末相當大量的資本應該已經產生出來，而且在真正的人的手中了。

因為，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官僚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集體剝削勞動人民，那末，至少一部份官僚層應該已經積累了足夠資本來買下國有化工業。

但是那個情況並沒有發生。當時的官僚明顯怕不是資本家，因為他們沒有像在資本主義之下那樣積累資本。現在他們在新形勢下搶著要做資本家——變成他們原先不是的那個東西了。而且他們想要在事先沒有足夠資本的情況下這樣做，所以就進行偷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就在這個實際情況下倒塌了。

蘇聯是官僚集產主義國家這個理論認為，官僚層已經變成一個新形式的統治階級。它以新的、過去未經過的方式剝削工農。它不是資本家，而這個社會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積累的基礎上運轉的。

根據官僚集產主義理論的建設者們的意見，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們都錯了，因為後者相信：人類的選擇，不是資本主義（如果它不被推翻的話，它就會墮落為野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們覺得，蘇聯及類似社會的歷史証明，第三個結局是可能的，而這個新社會有一些非常不吸引人的特徵，例如

官僚極權主義獨裁。這個理論經得起蘇聯崩潰的歷史現實考驗嗎？這個理論遭受到與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所遭受到的同樣困難，因為雖然它認為官僚層並不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剝削勞動人民，它卻認為官僚層的確剝削他們。那末，“官僚集產主義者”的財富的規模為什麼沒有大到足以被轉變為資本來將經濟私有化呢？

蘇聯崩潰的主要特色，是統治官僚層向資本主義復辟轉變。那就是說，他們正試圖廢除他們在其下成長的制度（第一批蘇聯官僚已全部死去），即他們在其下獲得特權的那個制度。

這不是最奇特的歷史發展之一嗎？如果官僚層是一個資本主義被推翻後所興起的新形式的統治階級，它之明顯地想要轉變為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的欲望，就非常奇特了。

即使我們假定，官僚集產主義理論對蘇聯而言是正確的，這個制度的崩潰，以及它的新形式統治階級之想變為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欲望，都証明這個制度是不能長期地獨立生存的，也証明它的統治階級已經得出這個結論了。

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從其走上政權直至衰落，大約經過六十年。這段時間，用歷史來測度，不長。所以，“第三條道路”，儘管它存在了短暫時期，從來不是一個能獨立生存的新形式社會。就歷史的意義而言，蘇聯的崩潰証明，除了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兩個選擇之外，基本上沒有第三個選擇。

霍與史兩位作者說，正像資本主義初起時期那樣，俄國若要恢復資本主義，不得不要經歷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他們也指出，為了資本主義能在俄國運轉，另外的階級——無產者們——必須開始存在。他們寫道，在蘇聯，“俄國工人當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在實際的意義上他們‘擁有過’，而且許多人仍然‘擁有’他們的工作。他們有過長時期建立起來的權利去得到房屋、國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托兒服務和為數甚多的國家補助。這些社會財產權利，在向‘正常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正被破壞。前蘇聯的大多數人民，在被剝奪被‘擺脫了’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持有和擁有之後，被迫到市場上去，用一句馬克思的話，除了自己的氣力之外別無他物可賣。”

換句話說，在這個新創立的市場中，勞動力已經或者正在再度變為商品。霍與史指出，這個過渡的後果已經是澈底的災禍。在改革的第一年，工業生產就低落了26%。這比蘇聯最後

幾年的幾個百分點的低落更差了。

“在1992年至1995年之間，俄國國內生產總值跌落了46%——比〔1929年-1939年〕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的收縮還要壞。自從1989年以來，俄國經濟已經降低了一半，而且繼續在降低。自從1991年以來實際收入已低落了40%；80%的俄國人沒有儲蓄。俄國政府，因經濟活動的崩潰而破產之後，已停止支付數以百萬計的雇員及家屬的薪金。失業人數急劇增加，特別是婦女。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俄國一億四千八百萬人口中，有4千4百萬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貧窮線的定義是每月生活費32美元)；四分之三的人口每月生活費少於100美元。”

兩位作者進而列舉了預期壽命的下降、自殺、酗酒的上升、兒童被遺棄事件的增加等等社會指標。明顯的是，從工人的立場來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個災禍。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官僚集產主義理論的支持者們怎樣解釋這個現實呢？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產主義在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優越嗎？在那些方面？像工作保障、養老金、公費醫療、房屋津貼和免費教育等等以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為基礎的事物和其他革命成果不就是托洛茨基的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值得保衛的東西嗎？

托洛茨基的觀點

現在我們就轉到托洛茨基的觀點吧！托洛茨基在1938年如此總結蘇聯的前途：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從十月革命中興起。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開展了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各機構，經歷了澈頭澈尾的墮落：它已由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變成官僚層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變成官僚層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對國家經濟怠工的一個武器了。一個落後而孤立的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變為一個全能的特權階層——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在實際上也是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就是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兩者擇其

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將會推翻新的財產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工人階級摧毀官僚制度，開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3〉

第一個選擇不正是正在發生的道路嗎？一部份官僚層開始對西方產生好感。智識份子中比較享有特權的層份——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等——非常羨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同行，因為後者有比他們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國有企業的經理們也有同樣的心境。

說蘇聯是一個沒有特權官僚層的無階級社會的那個官方的意識形態是如此與官僚的現實相異。連特權層本身亦對它持懷疑態度了。他們不再相信社會主義，連作為一個遙遠的目標也認為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只要從葉利欽原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一成員而看出它實在是一個多麼反對共產主義的機構呀！

但是，大部份這些事情已經存在很久了，事實上幾十年了。最後是什麼事情引致官僚層採取決定性步驟來恢復資本主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檢討一下支持官僚墮落工人國家的理論的人們的一些缺點，會是有用的。

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行動所引起的恐怖，受到廣大動員起來的蘇聯人民的抵抗。他們忍受巨大的犧牲(大約二千萬人死亡)，阻止、擊碎了德國的戰爭機器。戰爭結束之後，蘇聯人民的另一次巨大動員，發生在國家的重建之中。計劃經濟在推進這些大成就時的固有能力，是明顯地被蘇聯群眾了解的。

在戰後時期，蘇聯的孤立被局部地打破了。為了對抗西方所發動的冷戰，革命被擴張到蘇軍所佔領的東歐國家去，雖然這是用官僚、控制的方法所達到的。中國革命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殖民地世界中的怒潮，整體而言，至少使這些新興國家與蘇聯及其集團結成友好關係。

雖然革命沒有在帝國主義西方爆發，而這個事實最終會對日後的崩潰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對當時的許多人而言，歷史似乎是在蘇聯的一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的領導層都得出這樣結論：托洛茨基在1938年所提出的這兩個選擇已經被繞過了。

我當時是那些領導層的一份子，我也是這樣想的。雖然這個觀點沒有被明晰地寫下來，

我們的文件只是省略了資本主義會復辟這個可能性。計劃經濟的成就是動人的。儘管蘇聯還是落後，它卻已經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的抵擋得住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

人民需要民主

蘇聯有原子彈。在蘇聯集團之內，科學、基礎教育和藝術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和北朝鮮的軍隊的奮勇抵抗，使華盛頓陷入僵局。我們當時就認為，工人階級已經强大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已經深入到官僚層不可能推翻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了。

我們當然知道，計劃經濟已被這樣的事實所扭曲：它是由官僚層來計劃的；沒有工人們的參與，它不能夠充分發揮它的潛力；而且我們沒有工人民主，工人的參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沒有充分重視托洛茨基曾經指出的一些事情：只要官僚的計劃抄襲西方所發展的大量生產的技術，它就可能成功，甚至會有些大的成功。他在1936年寫道：

由官僚下命令，根據西方現成模型，建立巨大工廠，是可能的——雖然，確實地說來，花三倍於正常的成本。

但是你走得越遠，經濟就越會遇到質量的問題，好之質量就會像陰影一樣從官僚層的手上滑走。蘇聯的產品就好像被打上了灰色、冷漠的商標。在國有化經濟之下，好的質量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批評和創意的自由——這些條件是與一個極權主義的、具有恐懼、謊言和諂媚的政權不相容的。蘇維埃民主不是一個抽象政策的要求，更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標準。它已經變成爲這個國家的一個生死攸關的需要。〈4〉

缺乏社會主義民主的結果是，到了1970年代，蘇聯經濟就停滯了，其後，就真正地縮小。這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一次。官僚層中較有遠見的人們開始覺得社會與經濟計劃都需要更大的公開性和更多的透明度。

在群眾中間，特別是在東歐，而且也在蘇聯，有了爭更多民主的運動。蘇聯及東歐在教育、工業化方面的成功意味著，勞動人民和中等階層就有比在1920年代後期斯大林鞏固了官僚層權力時的蘇聯群眾的文化水平更高的文化

水平。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

這個過程終於引致戈爾巴喬夫發動glasnost(開放)和perestroika(改革)的運動。應該被注意到的是，戈爾巴喬夫的建議，是朝向逐漸引進資產階級民主的各方面，而不是朝向引進工人民主。那就是說，他的建議並不朝向授權給工人和農民來民主地管理他們的企業，或者恢復蘇維埃爲工農委員會來真正民主地管理政府和經濟計劃。

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運動，不但受到官僚層中較有遠見的層份的歡迎，而且受到蘇聯群眾的歡迎。後者要從窒息人的官僚拘束中解脫出來，實現更多的民主權利，促使政府的民主運轉。這些強烈的渴求都是進步的，值得支持的。

在戈爾巴喬夫的執政下，中央對經濟行政的控制被拆卸了，但是沒有被從下面來的人民控制所代替。這個結果是中央變得無能無力。官僚層對政治爭論、政治信息和政治活動的全權主義控制的放鬆，使得官僚層本身的權力和特權成爲問題。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面對著瓦解中的“指令”制度，官僚層要保持對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特權享受，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合法化的道路”，把那些特權與私有財產聯繫起來。

官僚層怎樣能夠開始走這條道路而不激發一次內戰呢？當托洛茨基在1938年爲蘇聯粗略地指出這兩個可能的政治後果時，他認為任一條道路都會引致一場暴力鬥爭。這在1938年無疑地是真實的。工人們之中仍然有1917年的一代。大多數人民相信社會主義，雖然他們在斯大林主義獨裁制的壓迫下非常惱怒。

現在明顯的是，蘇聯工人階級在1989年的自覺程度與1938年不同，縱然當時有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經過了四十年的徒勞無益的官僚統治，社會主義意識已經退潮了，特別是在蘇聯所面對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

再說，現在沒有一個政黨站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推動蘇聯的再生，不像1938年還有數以萬計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活在人世，縱使他們大都關在牢獄中。現在已經沒有與革命有活生生聯繫的幹部。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沒有人領導了。

因此，這個在1920年代官僚層篡奪政權時就已開始的反革命活動，在官僚層復辟資本主義的方案中達到了高潮，而且是在沒有內戰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個過程並不是沒有遭遇到工人的抵拒。地區、地方性的罷工和示威時有發生，有些還遭遇到警察的暴力。有跡象顯示擴大到全國範圍。

東歐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並沒有像俄國那樣災難重重，但是那裡的工人階級也遭遇到巨大的損失。前蘇聯和東歐的各共和國的工人們都記得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那些社會收穫。他們將會越發抵拒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使他們的生活程度降低。

只有通過這些鬥爭，社會主義的意識才能再度興起，新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才能建立起來。前蘇聯和東歐的工人知道他們不要倒回斯大林主義。他們正在和將會知道資本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譯者註〕：Nomenklatura 是俄國術語。它是用來描述該國持高級職位的人們，這個職位的任命是蘇聯共產黨統治圈子所授權的。現譯為權貴們。

註釋：

- 〈1〉 這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紐約，Pioneer Publishers，1937年)中所引用的句子。
- 〈2〉 列寧，《國家與革命》，收集在《列寧全集》，第25卷，(莫斯科，Progress Publishers，1977年)中。
- 〈3〉 托洛茨基，《過渡綱領》，收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紐約，Pathfinder Press，1973年)一書中。
- 〈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譯自2001年9/10月號《逆流前進》雙月刊。作者謝波德曾擔任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組織部書記。〕

原文題目：Less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原刊雜誌：Against the Current

各小標題由本刊編者所加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leaders of the Cadre Scho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ve published papers to discus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proposed the advancement of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 party democracy. The 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CCP organ *Qiu Shi*, and they can be seen a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his autumn.

The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CCP Cadre School, Wang Weiguang, said in No.11 of this year's *Qiu Shi*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ocial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re can be guarantee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essay started with pointing out five areas of "relative imbalance" between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1.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areas of public education, health and sanitation, scientific innovations,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aid, social security, and handling of social crises;
2.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at the income discrepancie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and also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occupations are big;
3.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that the Chinese labour force is 890 million, bigger than the sum tota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During the tenth Five Year Plan, the new increase of labour force every year is 10 million, the redundant staff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s 10 million, and in addition, almost 150 million rural surplus labour require jobs; the supply of labour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demand;
4. overall human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in some places, the safety of workers is neglected, and serious hazards happen;
5.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urgently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mode of leadership and exercise of power requires further reform;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equire transformation;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for macro re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especially the handling of social crises, need to be enhanced; the personnel system requires serious reform; integrity and honesty of the Party and monitoring of power require stepping up.

To deal with the above shortcomings or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d a long series of reforms including deepening of political reform,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grassroots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of policy-making, setting up of an honest, non-corrupt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ystem, etc.

How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Zhang Kai

From the essay, one can see that there exist serious problems in today's China, and there is pressure for reform in all areas. Although the essay cannot possibly go as far as proposing revolution instead of reform of the existing bureaucratic system, the problems listed reflect the anxieties of the ruling bloc. The CCP has not avoided disclosing their concern. For example, in April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sent guidelines to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o be strictly vigilant against Nine Factors of Instability, which included the demand to rehabilitate June Fourth, Falungong, terrorists fighting for minority rule, unrest caused by laid-off workers; urban residents losing their homes and rural farmers losing land, and graduates unable to find a job. Also included are the electoral victory of Chen Shuibian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rumours spread through the internet, foreign forces infiltrating into China with religion, and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See *Wen Hui Pao* 4 June 2004) There are also other issues to be worried about, such as the strife between different territorial interests. The *Singapore Channel Times* reported that at the Political bureau meeting, the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Chen Liangyu, accused the Party Central's macro readjustment as damag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regions.

The pressure from the people for democracy is reflected in the opinions expressed by people within the Party. In *Qiu Shi*, No.12 of 2003, the essay "Furthering popular democracy through Party democracy", the writers were Yin Xiaoying, Deputy Dean of the Central Socialist Science Academy, and Li Qinghua, Ph.D. candidate of the Central Party Cadre School. The essay said, "now, the wave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re sweeping the world, and the clashes, comparisons and competition among various values, political cultures and political paradigms have posed challenges to our Party. From the frustrations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to the lessons of some old parties one after the other losing their ruling power, we should learn that it is a dead end if we do not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t is also a dead end if we do not reform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ractice party democracy and popular democracy. Hence,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furthering party democracy and popular democracy is direly urgent for the Party."

According to Yin Xiaoying, on the question of Party democracy, one issue most resented by CCP members is the appointment of cadres. Although the rules prescribe election, there are many interventions, such as arranging for someone to stand in the election but lobbying for others to not vote for him; the "candidate" does this in exchange for a better job arrangement. No need to mention the idea of CCP members having any say in the drafting of Party political line or policies, or monitoring of the leaders in the hierarchy.

Yin Xiaoying, when interviewed by the *Finance and Economy* magazine, said, "as Deng Xiaoping pointed out in 1980, all power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Party. Under the Party's slogan of 'monolithic leadership', the Party replaces the government in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Party takes up many tasks that it should not take up or is not capable or competent in taking up, and this affects the Party's ow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rule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e are not experienced, and we learned from the Soviet model. Organizationally, we have the unitary and comprehensive nomenclature system, and cadres that should have been elected are in fact appointed."

While Yin Xiaoying proposed the separation of CCP and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reiterated that this was what Deng Xiaoping had proposed in 1980, she could not give any recipe for its realization since power is so concentrated in the CCP, so not even Deng Xiaoping making the proposal over 20 years ago could have this practiced. Still, such views openly articulated in the CCP organ reflect the acuteness of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CP today. Only with the end of the CCP's one-party dictatorship can there be democratiza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enjoy genuine democratic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for CCP members to enjoy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20 July 2004

香港	2	中港人民大團結！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中國人民！.....	社論
	3	港人偉大力量的又一次動員.....	軍行
	4	踴躍投票選出港人的優良代表.....	振言
	6	香港言論自由在受侵害.....	微波
中國	7	平反八九民運！立即釋放蔣彥永醫生！.....	社論
	8	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和黨內民主？.....	張開
國際	11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在印度孟買開會.....	兆立譯
	12	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國際會議聯合公報.....	兆立譯
	13	為同性戀的解放而鬥爭.....	德魯克、維托里努
	16	歷史不會停 信念不會改.....	浪果
理論	19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三） 第十章 托洛茨基與猶太人問題.....	曼德爾
特譯	25	歷史的教訓和理論 ——蘇聯崩潰後討論有關蘇聯性質的各個理論問題...謝波德著	兆立譯
英譯	31	How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1 NO.2

15 September 2004

Hong Kong

- 2 For solidarity between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End One-Party-Dictatorship! Power to the Chinese people! Editorial
- 3 Yet another great mobil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Jun Xing
- 4 Actively vote for goo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Zhen Yan
- 6 Hong Kong freedom of speech is being violated..... Wei Bo

China

- 7 Rehabilitate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mmediate release for Dr Jiang Yanyong! Editorial
- 8 How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Zhang Kai

International

- 11 Meeting of the radical anti-capitalist left in Mumbai..... Pierre Rousset
- 12 Document: Communiqu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Radical anti-capitalist parties....(tr) Zhao Li
- 13 For lesbian and gay liberation Peter Drucker, Sergio Vitorina
- 16 History will not halt, and faith will not dwindle Lang Guo

Special Article

- Trotsky as Alternative (part 13)..... E. Mandel

Theory

Lessons and theories of History

-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on the nature of the USSR after its collapse..... Barry Sheppard

Article in English

- 31 How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Zhang Kai